

理论与实践

LILUN YU SHIJIAN

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月刊
ZHEXUE SHEHUIKEXUE ZONGHEXING YUEKAN

一九六〇年 四月号



目 录

坚持列宁主义的战斗性，

彻底粉碎修正主义思潮 张 海 周修启 (1)

——紀念列宁誕生九十周年

学习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論，

警惕帝国主义战争阴谋 南师正 (10)

——紀念列宁誕生九十周年

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 杜国庠 (16)

論我国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 丘谷間 (24)

略論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与消費的关系 黃家駒 (29)

学习毛主席軍事思想，

提高对民兵战略地位的認識 陈 新 (32)

否認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必然走向康德主义 鍾哲人 (35)

老子哲学的唯心傾向 刘 节 (41)

“支援”解 于 厘 (49)

动 态

广东哲学界座談关于开展思維与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的爭論

广东經濟学会通过今年工作計劃，决定举办政治經濟学講座

迎接文教战线群英大会，广州各高等院校积极展开科学研究活动

广东社联积极开展自然辯証法的研究活动

紀念列寧誕辰九十周年

堅持列寧主義的戰鬥性， 徹底粉碎修正主義思潮

——紀念列寧誕生九十周年

張海 周修啟

偉大的列寧的一生就是戰鬥的一生。他為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指出了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和到達徹底解放的勝利道路。列寧在領導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以及一切敵人的鬥爭中給我們做出了榜樣。列寧深惡痛絕地揭露和申斥了一切企圖把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偷運到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來的行動和傾向，不倦地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戰鬥性和革命性。列寧主義是在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產生的，也是在同一切階級敵人和一切機會主義搏鬥中發展起來的。在這個鬥爭中，列寧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共產主義變成現實，並大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現在，帝國主義者，特別是美帝國主義者，一面加緊備戰，一面則在和平的偽裝下，利用各種各樣的卑鄙手段，從內部顛覆社會主義國家，毒害各國勞動人民對社會主義事業的信心。在這個劇烈而尖銳的國際階級鬥爭中，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分子充當了它們最好的助手，散布資產階級的思想毒素，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破壞各社會主義國家間的團結，妄圖把全世界人民引上向美帝國主義屈服的道路。我們國內的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也妄圖把我們引向資本主義的道路。

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是資產階級利益的保护者，因此反對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是戰勝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我們必須學習列寧的革命堅定性和戰鬥性，從列寧主義的豐富寶庫中吸取智慧和力量，來向一切修正主義思潮進行不調和的鬥爭。

(一)

修正主義出現於十九世紀末葉，亦即資本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的年代。當時，馬克思主義已經無條件地戰勝了工人運動中的蒲魯東主義、巴枯寧主義之類的思想體系，成為歐洲各

国工人阶级政党的纲领和策略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迫使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不得不采取新的伎俩，他们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来达到瓦解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修正主义的创始人是德国的伯恩斯坦，以及将其思想付之实践的法国人米勒兰，后来的主要代表者是从调和主义开始而最终堕落为革命叛徒的考茨基。当时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主义等等，都是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

列宁从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起，便遇到了共产主义运动道路上的这块绊路石，粉碎修正主义，便成为列宁极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列宁光辉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并在与修正主义作无情的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修正主义者用整套资产阶级思想学说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千方百计地企图割裂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战斗性。

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者企图以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来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宣传“回到康德那里去”，宣传哲学的“无党派性”，他们以庸俗的进化论来代替革命的辩证法，企图调和以至消除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伯恩斯坦在其所著“社会主义问题”一书中就公开宣布：辩证法“对于科学是一个极大的危险”，是“走向正确认识道路上的陷阱”。考茨基则宣称：马克思同新康德主义结合起来是完全可能的。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则说道：不是社会主义者，也可以是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坚决地斥责了修正主义的哲学观点。列宁不止一次地指出：哲学的党性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哲学领域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反映了阶级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修正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目的，是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阶级和平”的工具。首先从思想上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修正主义者则以所谓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来混淆是非。修正主义者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组织卡特尔、托拉斯等的出现，就能够消灭资本主义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可以从此消灭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经济危机；可以缓和阶级矛盾。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垄断资本就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同时，他们还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原理，否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创造了“生产力论”，来证明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列宁揭穿了修正主义的这种诡辩。列宁指出：垄断组织的出现，把生产统一起来了，这就是资本集中的必然现象。资本的集中只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性日益加剧，使其矛盾和危机更加深刻化，而且带有更大的破坏性，个别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可能是改变了，但矛盾和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现象，垄断资本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和破坏力量了。垄断资本也使无产阶级日益贫困，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垄断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这个英明的论断，已经为历史发展的事实所证明。

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者抓住资产阶级在“和平”时代对工人阶级所实行的“让步”，加以夸大，只看到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策略的改变，而故意抹杀这种策略改变的实质。他们宣称：资产阶级所允许的“政治自由”“民主”以及“普选权”，已经使阶级矛盾“调和”和“缓和”起来了；《共产党宣言》上所谈的“工人无祖国”这个老原则已经成为不正确的了，工人已经有了“政治自由”和“普选权”，就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了，国会制度使一切公民都同样有“投票权”和“参政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没有必要了。

列宁揭穿修正主义这种谬论，指出修正主义把国家看成是超阶级的，看成是维护一切阶级的利益的机关，掩饰和抹杀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本质，企图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抛弃马克思主义必须用强力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这就是抽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髓，从最根本的地方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妄图使工人运动屈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

列宁坚决地驳斥了修正主义这种贩卖社会主义利益的论调，斥责他们是比资本家本身更好的资产阶级的保卫者。列宁说道：“只要各种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只要资本的统治还存在，尽管实行个别的改良，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

固然，修正主义者有时也承认阶级斗争，但是，正象资产阶级理论家一样，他们只把阶级斗争局限于经济斗争而反对政治斗争，特别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然而，无产阶级专政恰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列宁说过：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自甘跳入修正主义的泥坑，就是贩卖马克思主义。

历史多次证明，剥削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无产阶级不采用革命手段，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不建立自己的专政，便不可能镇压资产阶级必然的反抗，便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修正主义者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不民主”，是“独裁”。而马克思主义却认为：甚至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无非是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机器。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中，资产阶级民主也是资产阶级专政。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对所有的人实行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也就不可能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平发展的结果，而只能是摧毁资产阶级专政的结果。当然，无产阶级专政同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个区别，正如列宁所说：“地主和资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反抗。相反地，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少数地主资本家剥削者的反抗。”（“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

帝国主义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修正主义者在这个时代以伪善的面孔站出来宣扬“阶级和平”，宣扬阶级矛盾的“调和”，宣传改良主义和“纯粹民主”，这就显出其更加卑鄙和恶毒。

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前夕，以叛徒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进一步堕落成社会沙文主义。列宁说道：“社会沙文主义是米勒兰主义和伯恩斯坦主义底直接继续和完成。”（“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底破产”）发展到社会沙文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公开地、赤裸裸地同本国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受资产阶级剥削的无产阶级群众，帮助本国资产阶级去掠夺和压迫弱小民族。修正主义走上这条道路，是他们贩卖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和必然的结果。

修正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修正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它的出现是国际现象，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垄断资本能够利用其高额利润的一部分，通过各种方法收买一批工人上层分子，在工人阶级内部豢养一小撮特权阶层，这些工人贵族由于在资产阶级手中取得“津贴”，他们竟以本身生活较优裕而满足。列宁说道：“他们从本国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余羹，他们摆

脱了破产的貧苦大众的灾难和痛苦，同时也丧失了貧苦大众所具有的革命情緒”，（“第二国际的破产”）在工人队伍中宣扬与资产阶级調和，宣传“改良”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列宁也指出了修正主义的阶级根源，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同无产阶级一起存在的还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小生产者中间的絕大多数，面临着在竞争中破产的命运。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时也被卷入工人运动中来，成为革命的同路人。他们只是为了追求其狭隘的阶级利益而参加革命，沒有要用革命手段来反对资产阶级的要求，更沒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愿望，只想通过“立法”，“改良”的途径来满足其狭隘的利益。因此，当资产阶级采取了某些“让步”、“改良”的欺騙策略时，他们就心滿意足了。列宁說得好，无产阶级是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小资产阶级則是要用改良主义“改善”帝国主义，迁就帝国主义。德国革命家卢森堡說道：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理論并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錯誤思想，而是一个錯誤地把自己認為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资产阶级人物的思想。

修正主义思潮曾經給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危害。十九世紀末米勒兰参加了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法国资产阶级借助于这些“工人貴族”而分裂了工人运动。德国1918年11月革命，也是断送于修正主义分子之手。正是这些修正主义分子，用卑鄙的手段杀害了德国工人阶级卓越的领导者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俄国的修正主义分子也曾給革命的进展造成了困难。

列宁毫不留情地揭露出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队伍中的代理人，他们的活动只是为了使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适合于资产阶级的口味。“临时应付，迁就眼前事变，迁就細小政治变动，忘記无产阶级底根本利益，忘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底基本特点，为謀暂时的实际利益或想象中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底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列宁：“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由于他们口头上挂着馬克思主义，披上了馬克思主义外衣，就更能欺騙群众，其危害性也就更大。

列宁坚决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胜利，奠定了穩固的基础。列宁不仅复活了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閹割了的馬克思主义，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进一步地向前发展了馬克思主义，并且用之来指导俄国革命的胜利。大家知道，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机会主义者統治了第二国际，在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进一步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它們帮助资产阶级来欺騙人民，在“保护祖国”的幌子下，挑拨各国工农互相残杀。列宁对修正主义坚决无情的斗争，清除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对各国无产阶级的影响和統治，使机会主义彻底破产，为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搏斗揭开了序幕。击潰机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进行胜利斗争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列宁对修正主义这种无情斗争的坚定立场和态度，是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典范。紀念列宁，必須学习列宁对修正主义毫不調和的立场，必須对修正主义和任何修正主义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洁性和革命性。

（二）

列宁根据国际工人运动的斗争經驗，預见到革命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在十九世紀末叶进行的思想斗争，不过是无产阶级伟大革命搏斗的序幕而已。他教导我們說：“凡现时我們往往仅在思想方面经历着的事情，即同那些修正馬克思理論的人进行的爭論；凡现时在实践

方面仅按工人运动个别局部问题暴露出来的事情，即我们与修正派间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这在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是工人阶级一定要在更大得无比的范围内经历到的，因为无产阶级将使一切争论问题尖锐化，将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对于决定群众行动有最直接意义的各点上，将迫使我们在斗争激烈时区分敌友，抛开那些恶劣的同盟者，以便给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

现在，正如列宁所预示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被列宁所彻底粉碎了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借尸还魂，用新的姿态和“新”的手法，“在决定群众行动最有直接意义的各点上”来进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活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坚决粉碎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新的神圣任务。

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胜利。世界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阵营蒸蒸日上。苏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我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影响的不断增长；以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扩大和加深等等，这一切，都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惊慌失措。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便加紧进行破坏和分裂活动。它们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公开的诬蔑和攻击遭到破产之后，就把希望寄托在收买，特别是要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内部找寻不坚定分子来为它们服务，妄想从内部来瓦解社会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出现，就是帝国主义这种进攻的结果，是反动派从思想上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反映。

现代修正主义的出现，还有其国内根源，资产阶级的存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影响和小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存在，这是修正主义之所以产生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正如莫斯科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

目前世界正处在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正是反映了新兴的社会阶级力量同垂死的社会阶级力量的尖锐的斗争。现代修正主义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挂着共产主义者的招牌来欺骗无产阶级，引诱无产阶级离开革命的道路，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轨道，其危害性就特别大。因此，现代修正主义是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主要的危险。站在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最前线，坚决粉碎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是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前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又是杰出的理论家和科学家。毛泽东思想就是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继承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一切敌人进行不调和斗争的风格，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一道，站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最前列，为击溃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先后发表的，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之下，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专政的丰富经验，特别是指出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的国际意义；阐明各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普遍规律；痛斥了帝国主义和一切阶级敌人所发动的反共反苏的阴谋活动；强调了世界无产阶级团结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意

义，捍卫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特别重要的是指出了反修正主义的必要性，指出现代修正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2月还特别着重地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概括起来，“在思想方法上是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诡辩代替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在政治上是用反动的超阶级的国家论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论，用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来代替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为垄断资本辩护，混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

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他们欺骗、腐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帝国主义特别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最险毒的最根本的手段，就是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髓，重复老牌修正主义的反动的“超阶级国家”论，来否认实行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宣扬其“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腐臭论调。

整个南共纲领草案，非常突出地贯穿着老牌修正主义者曾经宣扬过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这个纲领中它们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说成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它们公然露骨地写道：“资本主义世界蓬勃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趋势极其明显地证明：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不可阻挡地深深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这样，它们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说成是一个局部改良的过程。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进一步加强和集中的表现，是使资本主义国家日益从属于垄断组织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反动性、寄生性和腐朽性也跟着进一步增长、加深。这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日益成熟。但是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决不可能自发地从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的。正当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日益对全世界人民发生深厚影响的今天，现代修正主义者重复曾经为列宁所无情揭露和申斥过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又一次证明它们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服务的真面目。

现代修正主义者不遗余力、喋喋不休地来宣扬“超阶级国家”论，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南共纲领草案中写道：由于垄断资本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资产阶级国家日益“把自己置于社会之上，表现其日益限制私人资本作用……的倾向”。又写道：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是“劳动关系和财产关系、社会权利和社会服务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的调节者”；“社会主义因素”正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形成；工人阶级只要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中“取得决定性的影响”，就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些谬论同老牌修正主义一样，其目的是力图掩盖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一本质。他们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已经“过时”了。妄想引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否认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必要性，否认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充分揭破了修正主义的一切谎言，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社会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先决条件。现代修正主义为了更进一步破坏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信心，他们在对资产阶级国家歌

功頌德的同时，还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而肆意誣蔑和攻击社会主义国家，丑化无产阶级专政，把它說成是“极权主义”、产生“官僚主义”的“基础”和使“政治领导力量脱离劳动群众。”借此来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

无产阶级专政是把对反革命力量的专政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广大的劳动群众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因此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应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也不应该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那些离开无产阶级专政而高谈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而反对无产阶级，实际上是要求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再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無論在任何情况，用什么借口来否認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都是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誘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现代修正主义的目的就在于此。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为了削弱、打击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瓦解共产主义事业，还进一步歪曲和抛弃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說，宣扬其否認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謬論。南共綱領草案中公然写道：“共产主义政党可以垄断社会主义运动的每种形式，并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这些党里，也只有通过它們才能体现出来的观念，在理論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中也是十分有害的”。它們还誣蔑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本国不再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革命性、創造性的推动因素”。并狂妄地提出美国无产阶级可以不必要成立共产党。它們认为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作用只能是“思想因素”，而不能是“政治因素”和“政权因素”。宣扬以“工会”或“工人委员会”来代替共产党。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討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要把党从一个战斗的、集中的、具有严格紀律的革命組織变成清談俱乐部、变成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政党。这是老牌修正主义的工团主义观点的翻版。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說：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上，以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統一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领导者和組織者，是无产阶级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設中贯彻领导的体现，是获得胜利的根本保証。帝国主义就是企图从瓦解无产阶级政党去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现代修正主义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說，正好符合于帝国主义的詭計。

对无产阶级來說，只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革命运动才不致于迷失方向，无产阶级才能引导群众走向共产主义的胜利。这已經是为近百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所充分証明了的真理。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还贩卖老牌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以民族主义来代替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貨色。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各国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在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而形成一個强大的世界体系，結成为一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之后。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之間的团结，就成为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核心，是人类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証。捍卫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结，就成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内容。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却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附和帝国主义所提出的所謂“民族共产主义”的謬論。他們抽掉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阶级内容，說什么“只能以实现各民族政治和經濟上的完全不等的愿望为基础。”在修正主义分子看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民族平权；无产阶级为了共同事业和目的的国际义务是不存在的；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之間、社会主义各国之間的互助合作、互相支持的原則是不必要的。这是彻头彻尾的資产階級民族主义的观点。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标榜所謂“民族利益”和“民族特点”，而否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規律；否認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否定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附和帝国主义“民族共产主义”的叫囂。这在实际上是对自己民族的出卖，恰好符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在修正主义集团控制下的南斯拉夫的越来越露骨的投靠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証明他們正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罪人。“共产党人如果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同国际无产階級运动的总利益对立起来，借口前者而反对后者，在实际行动中不認真维护无产階級的国际团結，反而損害这种团結，这就是一种违反国际主义、违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重錯誤。”（“再論无产階級专政的历史經驗”）这种錯誤必然导致对本国民族的真正利益的叛卖。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特別恶毒地把社会主义陣营和帝国主义陣营这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世界政治經濟体系，說成是“世界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軍事政治集团”。他們故意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不把国际局势紧张的根源归咎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反而說成是由于两个“軍事政治集团”存在的結果。他們不遺余力地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效劳，否認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在捍卫人类社会进步和和平事业中的伟大作用，破坏无产階級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破坏国际共产主义事业。

所有这些，說明现代修正主义披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但它們攻击的正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最根本的东西。他們总的目的就是“企图誹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說，說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經丧失了意义。”（“莫斯科宣言”）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用这些反动謬論来为帝国主义，特别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进行欺騙人民的說教，这就完全暴露了他們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奴仆和走卒的真面目。南共領導集团的修正主义政策，越来越深地損害了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破浪前进，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却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沼。他們背叛了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結果，使南斯拉夫日益成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披着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挂着共产主义者的招牌，玩弄两面手法；并且由于它是一个掌握政权的領導集团，提出了一个执政党的完整的修正主义的綱領，它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害性特別严重，它是美帝国主义企图从内部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工具。因此，必須坚决无情地加以揭露，彻底粉碎其影响。这个斗争，正如195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社論所指出：“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条根本不同路綫，这是关系国际工人階級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成敗的一场大斗争。”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的統一，是每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神圣任务。

在帝国主义仍然存在，階級还没有彻底消灭，資产階級和小資产階級的政治思想影响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修正主义或者右傾机会主义思潮，总是会在适当的时机起来兴风作浪，妄图“修正”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思潮，在我国也必然有所反映。我国近几年来历史发展的事实，完全証明了这一点。毛主席早在1957年2月就教导我們：“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資本主义制度，他們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階級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以来的事实，完全証明了毛主席論断的英

明和正确。

1957年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势力曾经发动了一次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的蠢动，国际修正主义者充当了它们最好的助手。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配合国际反动势力向党向社会主义向人民的进攻中，国内修正主义也充当了它们的最好的助手。在1959年，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辉煌胜利，资产阶级面临最后灭亡的命运，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一股反映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反对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企图用修正主义观点来改变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他们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来对抗无产阶级世界观。他们诋毁党的群众路线和党所领导的群众运动，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看不见群众的力量，不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这个真理。他们又散布阶级分析法已经“过时”，宣扬其阶级斗争熄灭论和资产阶级的道德观、人性论；他们提出“唯条件论”来反对不断革命和革命发展阶段相结合的原理，反对把革命进行到底，他们竭力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的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他们要用少、慢、差、费来代替多、快、好、省，在他们看来多快好省是不可能兼得的，他们反对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也即反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他们把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具有无比优越性的人民公社，说是“办早了”、“办糟了”、“没有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他们反对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绝对领导，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而达到其篡夺领导权的目的。所有这些论调，在提法上虽然同老牌的修正主义有所不同，但是在本质上则是完全一致的。

不论是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也好，不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好，他们妄想要阻挡社会主义的历史车轮前进，这都是做不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战无不胜的真理，它的光辉永恒地照耀着共产主义的胜利道路，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指出前进的正确方向。社会发展正遵循着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掌握了客观规律前进。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无产阶级战士，必须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旗帜，站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最前线，为粉碎修正主义思潮而斗争到底！

1960年3月31日

学习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論， 警惕帝国主义战争阴谋

——紀念列宁誕生九十周年

南 师 正

(一)

列宁根据馬克思的学說和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科学分析，創立了完整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論，科学地闡明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的阶段，是无产階級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资本主义发展到了这一阶段，它的一切矛盾尖锐化到极点必然引起一系列的战争，并导致无产階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論，特别是帝国主义制度是战争的根源的理論，仍然是我們正确認識当前国际形势，警惕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争取世界和平的思想武器。

帝国主义者为了攫取垄断高额利潤，保持和扩大垄断資本的統治，总是要加强对本国劳动人民的剝削和压迫，用尽一切办法向外掠夺原料、劳动力、市场和投資场所，并且为此在垄断集团之間展开剧烈的斗争。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掠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是帝国主义垄断高额利潤的一个重要源泉，是帝国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命根子。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总要尽力霸占更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夺一切能够掠夺的国家，甚至梦想独霸全世界。而当用經濟的和政治的手段达不到其掠夺目的时，就进而采

用武力，发动侵略战争。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不是靠掠夺战争发展起来的。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这种掠夺性就显得越来越强烈。列宁指出：“资本主义越发达，原料越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越紧张，那末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越激烈。”^①可是，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全世界殖民地已經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完毕，这样，帝国主义国家之間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就孕育着战争。

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激化了。生产技术的空前发展，使得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成就，生产迅速发展，經濟力量迅速地增强起来；而一些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受旧的固定資本束縛，以及具有更大的寄生性、腐朽性等原因，生产停滞不前。这就使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可能迅速地跳跃式地赶上或超过另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从而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的对比，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变化着。这样帝国主义列强之間已經改变了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的对比，就同原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划分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就必然要引起帝国主义国家之間，为重新瓜分已經瓜分完毕的世界而展开尖锐的斗争。“要測驗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

^①“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3頁

真正实力，除战争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方法”^①“因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除非用暴力手段来重新瓜分殖民地，才能得到比较老的（以及比较弱的）帝国主义列强现在享有的那些权特。”^②列宁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对抗性的矛盾尖锐化，是产生现代战争的根源。

垄断集团对劳动人民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已经使国内劳动人民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一方面使它们彼此削弱，使帝国主义阵营中出现了最薄弱的环节；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战争又加深了垄断集团对本国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并给国内广大劳动人民带来更大的痛苦和灾难，这又必然增强劳动群众反对垄断资本的统治和压迫的斗争空前高涨，促使无产阶级觉悟水平、组织程度和革命决心的提高。从而有可能在帝国主义国内爆发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

帝国主义国家总是靠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来巩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统治的。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和掠夺，垄断资本集团对经济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又必然加速经济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大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队伍。随着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的奴役和掠夺的变本加厉，对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日益残酷，就愈来愈促使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以至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了反对帝国主义民族压迫的道路，加剧和扩大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列宁指出：

“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必然是它的民族解放政策的继续。”^③帝国主义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也是现代战争的根源。

列宁通过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掠

夺的本性的科学分析，得出了帝国主义制度是现代战争的根源的原理，多少年来一直指导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正确地认识复杂的国际形势，认清帝国主义战争的掠夺性质，鼓舞他们积极进行反帝斗争。今天，这些原理仍然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诚然，今天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而且它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大地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旧的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的瓦解，亚洲、非洲、近东和拉丁美洲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以及还在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这说明了东风压倒西风，国际局势正继续朝向有利于全世界争取和平和进步事业的人民方面，而不利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方面发展，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的战争计划被迫打乱了，这是国际局势的基本方面；但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范围大大地缩小和美帝国主义垄断集团独霸世界的野心勃勃，因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的斗争，帝国主义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帝国主义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斗争，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尖锐、复杂和剧烈得多。因此，决不能以为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已经改变了，帝国主义再不会发动侵略战争了，现代战争的根源已经不存在了。

只要帝国主义还没有灭亡，它总是要推行其侵略、奴役和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的政策。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示：“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下屠刀，他们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④列宁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3卷，第113页

③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3页

④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版，第11页

和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的本性、关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的科学论断，是連帝国主义分子也不得不供认了的。

美国最大石油垄断寡头洛克菲勒在1956年1月写给艾森豪威尔的秘密信中曾經提到：“美国的传统是先貿易而后軍旗……經濟政策是同軍事政策分不开的，……我們必須繼續采取目的在于創立和加强我們的軍事同盟的措施，因为这些同盟能够巩固我們在亚洲和中东的整个地位”。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去年12月7日发表的报告中也写道：

“战争的可能性必須正視”，“在目前情况下西方的威懾力量必須保持，不管保持多久，只要有必要，……”。約翰斯·霍浦金斯大学华盛顿对外政策研究所的一项官方报告中更露骨地說：“重要的政治或經濟問題上的国际爭端，还是会导至狂热的軍备竞赛的恢复，并且归根結底軍事力量和技术仍然将决定結局。”这些热中于战争的自白，难道不是帝国主义本性的最好的說明嗎？

现在，以艾森豪威尔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头子們，面对着席卷各大洲人民爭取世界和平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不得不在对外侵略中改变他們的手法，采用所謂“和平取胜”的策略：一面高唱和平腔調和玩弄和平的手法，用伪装的和平来配合战争准备，一面却更猖狂地扩軍备战。美帝国主义国民經济的进一步軍事化；以现代武器来武装西德和日本的軍国主义；干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拼湊軍事集团；到处建立軍事基地；进行核武器詭詐等等，都是美帝国主义的和平假面具后面的真面目。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今年向国会所提出的“預算咨文”中，规定1961年度的軍事开支达4,556,800万美元，占全部財政支出的57.1%。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嗎？代表洛克菲勒垄断集团利益和代表美国国务院意见的“美国新聞与世界报导”在去年年底刊登的一篇文章，供认了美帝加紧准备新战争的眞意，这篇文章写

道：“今天的世界有一种无法改变的趋势，那就是世界将由一个强国掌握霸权。敌对的强国或敌对的强国集团之間必然会展开冲突——軍事的經濟的冲突，这种冲突过去曾經，今后仍然可能引起实力較量。只有由一个强国独霸世界，才能建立免受核战争的保障。”这就在暴露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独霸世界的野心同时，表明了他們对于战争的狂热。

(二)

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而战争的性质則决定于战争的目的性。那么，我們应当以怎样的态度来正确地对待战争呢？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不是抽象地来談論对战争的态度問題。列宁指出：“从馬克思主义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在社会主义者討論应该怎样评价战争、应该怎样对待战争的时候，主要的問題是要弄清楚这个战争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那些阶级准备和进行的。我們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①有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战争，即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在现代历史中，一类战争是以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为目的，另一类是以反对掠夺和压迫为目的的战争。后一类战争也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国家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反侵略战争。列宁說：“现时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两个大强国集团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政策的繼續，而这个政策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总和所产生所滋养着的。但这个时代又必然要产生出并且滋养着反对民族压迫的政策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因此也就可能并且必然会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义和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融合等等。”^②无产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第367頁

^② “列宁全集”第23卷，第76頁

階級對戰爭的態度是：反對掠奪的非正義的戰爭，支持反掠奪反侵略和反奴役的革命正義戰爭。

殖民地附屬國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鬥爭以及工人階級勞動群眾反對壟斷資本的鬥爭，是當代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當資本主義進入了總危機時代，帝國主義三大矛盾就發展到極為尖銳的程度，帝國主義對殖民地附屬國進行瘋狂的掠奪激起殖民地人民強烈反抗，因而開展了由自發到自覺的政治經濟鬥爭，種這鬥爭政策的繼續就必然走上民族解放戰爭的道路。壟斷資本對本國勞動人民的殘暴的剝削和壓迫，也只能引起同樣的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縮小了，社會主義陣營壯大和發展了，帝國主義為了要在重重矛盾中找尋挽救其垂死命運的出路，除了加緊對國內外勞動人民的剝削奴役以外，就是連續不斷地進行着局部的侵略掠奪戰爭，并把對國內外勞動人民的剝削和奴役推到駭人聽聞的空前程度，其結果就大大加強了殖民地附屬國人民和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勞動人民對壟斷資本的反抗鬥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些殖民地國家在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支持下和本國人民堅決鬥爭中通過了和平途徑取得了政治獨立，但更多的例子是殖民地人民通過武裝鬥爭而取得獨立的。當然，能夠以和平的辦法迫使帝國主義勢力退出殖民地固然很好，但是無數歷史經驗證明，帝國主義和其他反動階級是不會自願放棄對人民的奴役的。當反動派用武力鎮壓人民的革命鬥爭時，武裝鬥爭就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同志在談到中國反對三大敵人的民主革命時指出：“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① 中國革命勝利的歷史和其他許多國家革命勝利的歷史，充分證明列寧的殖民地民族解放戰爭不可避免的原理的正確性和無限的生命力。

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目前正發展到尖銳程度，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反資本的鬥爭在各國不斷開展，當然各國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都有它本國的具体特点和具体道路，但階級鬥爭却是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必然會用暴力來對付無產階級。列寧說過：“資產階級使用武裝來鎮壓無產階級，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個最嚴重、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實”。^② 當無產階級為了生存、為了擺脫資本奴役而進行鬥爭的時候，壟斷資產階級會用它整套專政機構進行鎮壓，這就教懂了僱傭奴隸們，要解放就要拿起武器，沒有人民的革命武裝就不能粉碎反革命武裝，就沒有勞動人民的解放。所以列寧教導我們：“被壓迫階級如果不努力學會掌握武器，獲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當作奴隸使喚。”^③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為本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解放而拿起武器進行鬥爭是完全必要的。

我們面對着這種正義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獨立戰爭和反奴役反剝削的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當然不可能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列寧曾經反復教育我們，無產階級從來就不是毫無分析地反對一切戰爭。列寧多次地尖銳批判過那些不問戰爭本質一概反對戰爭的庸俗和平主義者。列寧指出：“在今天，宣傳和平而不同時號召群眾採取革命行動，這只能散播幻想，使無產階級相信資產階級的仁慈……認為不經過一系列革命就能實現所謂民主和平的想法，是極其錯誤的。”^④ 毛澤東同志也一再教導我們要支持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毛澤東同志曾多次指出了支持殖民地民族獨立鬥爭和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鬥爭的必要性。他說：“在帝國主義存在

①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00—601頁

② “列寧全集”第23卷，第77頁

③ “列寧全集”第23卷，第77頁

④ “列寧全集”第21卷，第141頁

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① 这里所说的人民革命自然是包括人民的武装斗争的。列宁和毛泽东同志这些教导，在今天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

社会主义国家一向是主张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向外掠夺外国的政策和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国家要求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

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首先在少数几个甚至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的原理，表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将是一整个历史时代，这就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阐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政策。在十月革命后，当他谈到苏联和美国可以和平共处时曾经指出：“若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是不不会触犯他们的”。又指出，在实际和平方面“我们这方面没有什么障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资本家方面的帝国主义才是障碍”。^②

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历史，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外政策，有力地证明我们是坚持列宁的关于和平共处的政策的。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再不会有战争了。因为历史事实不止一次地证明了列宁的论断：帝国主义是和平共处的障碍。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帝国主义进行了二十多次大小不等的局部战争。十月革命以后，继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年青苏维埃以后，就有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统治者，扼杀匈牙利的苏维埃政权，镇压德国、波兰、朝鲜等国的革命的历

史事实。以后虽然曾出现一个短暂的“相对稳定”时期，但很快又为帝国主义国内的经济危机和由危机所引起的局部战争所打破。例如1931年日本的侵略中国，1936年德国和意大利武装干涉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以后又有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战争等等，这些局部战争后来并发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局部性的战争更是没有间断过。1948年美、荷干涉印度尼西亚的战争，美国干涉希腊的战争，以美国为首打着联合国旗帜进行的侵朝战争；1952年美国武装干涉危地马拉的战争；法国侵略越南的战争，英、法侵略埃及的战争，美国侵略黎巴嫩的战争，法国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战争等等。当然，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结果并没有使它强大起来，相反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走上民族独立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道路，并且终于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但是，不能认为在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以后，上述的情况就已经完全改变了。帝国主义终究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的經濟基础仍然存在，帝国主义胎育战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列宁说过：“只有把政权交给另一个阶级（指无产阶级——引者），才能停止战争。只要政权还保持在统治阶级手里，和平是不会改变任何东西的。”^③

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虽然没有改变，但是，现在保卫和平反对战争的形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首先，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进一步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这是争取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基本保证。其次，近年来，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工人阶级在民族独立斗争中作用的加强，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力量

①“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出版社版，第9—10页

②“列宁全集”第30卷，第333—334页

③“列宁全集”第24卷，第123页

更加团结和增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制止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发动局部战争。同时，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劳动群众和爱好和平的人士，反对扩军备战，争取和平的斗争，日益蓬勃地开展和日益加强，这也是争取和平、保卫和平的重要力量。所有这一切的力量正在日益汇合成为一支强大的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这样就迫使帝国主义在发动战争时不得不考虑它的严重的后果，从而有了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可能性。

虽然全世界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群众运动，和平的力量已经超过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争取世界和平的条件更为有利了。但是，争取和平的斗争是一场极其复杂、极其艰巨的斗争。如果谁以为在当前东风压倒西风的条件下，帝国主义者会自愿放弃他们的侵略和奴役政策，“会用盘子把和平给我端过来，谁就是一个十分天真的人。”帝国主义的本质毕竟没有改变。在争取世界和平的问题上，我们对帝国主义不能有任何天真的幻想，更不应该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而是要把全世界人民都发动起来，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都吸引到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行列里来，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

掠夺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束缚住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手脚，使它们彻底孤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变为现实。

深刻地认识帝国主义孕育战争的客观必然性，认识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及和平共处的实质，正是为了更好地制止帝国主义战争，以便使我们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中，教导我们必须战略上藐视一切敌人，同时在战术上重视一切敌人，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应该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是反对，第二条是不怕。毛泽东同志于1957年11月6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讲话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俄国出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欧出现了更多的革命。如果帝国主义好汉们决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除了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灭亡以外，不会得到什么别的结果。”这是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最有力的警告，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最大鼓舞。

① 1958.10.1.人民日报

認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

(在一个学习会上的报告)

杜 国 庠

毛主席多次教导我們，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須宣传唯物論、宣传辯証法，这就是說，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論普及到我們广大的干部和群众中去，对于改进我們的工作，加速我們的經濟建設，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我們每一个相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都要来做这项工作。

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它正确地、全面地反映了宇宙发展的客观规律。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是創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論。“矛盾論”、“实践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这三个主要的著作集中地反映了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毛主席的其他許許多多著作，如“論持久战”“論人民民主专政”等等，也都包含着他的許多天才的哲学思想。下面講的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根据上述三个著作，特别是“矛盾論”这个哲学著作。这三个著作构成一个完整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論。你如果要学懂“矛盾論”而不联系“实践論”，那是不可能的；如不联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样就不能系統地理解毛主席如何創造性地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矛盾学說。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这一光輝的不朽的哲学著作，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問題和区别两类性質不同的矛盾的思想，在1956年发表的“关于无产階級专政的历史經驗”和“再論无产階級专政的历史經驗”这二个著作中就已反映了毛主席的这种思想。“关于无产階級专政的历史經驗”一文中說：“否認矛盾存在，就是否認辯証法”。在批評了那种認為唯心論和唯物論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中清除掉的錯誤观点之后指出：“……人們是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也就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个社会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滿无缺的。那个时候，人們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們之間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質和形式不同于階級社会罢了。”这段話，是說得非常深刻的。在“再論无产階級专政的历史經驗”一文中，揭示了在我們面前有两种性質不同的矛盾，一是敌我之間的对抗性的矛盾，一是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还指出：社会主义的經濟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經濟基础的需要，但是在这种基本适合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間，在上层建筑 and 經濟基础之間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到1957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对这两类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明确地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

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間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間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这是完全正确的、唯物辩证法的见解，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的划时代的发展。

毛主席提出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大家知道，1957年我国人民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时候，人们提出了问题：到底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呢？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地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且指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和敌人的概念的新内容，这样就为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革命时期一样，分清敌我界限，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是一个首要问题，因为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应该不同。毛主席说：“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处理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不许敌人乱说乱动，因为不这样做，敌人就会造反。造反，当然是不行的，不容许的；让敌人造反，我们就会亡党亡国，人头落地，对不住老百姓。“对敌人宽容，就是对人民残忍”，就是这个意思。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就只能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毛主席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概括为一个著名的公式：团结——批评——团结。这就是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好，解决了，就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就可以大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如果处理不好，使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就会给我们的工作找来麻烦，招致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损失。我们党在历史上曾吃过这个亏，例如从前的王明路线，在党内斗争上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这是对我们的事业非常不利的。所以，毛主席在1942年发表的“整顿党的作风”中就说到：对党内犯错误的同志应该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可见，毛主席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思想早就存在。到了1957年，毛主席全面地深刻地阐发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矛盾学说划时代的发展。如果我们承认矛盾斗争是自然界发展、社会发展、思想发展的动力的话，那就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共产主义社会也有矛盾，那就不可能设想一个没有矛盾的社会。因为没有矛盾，就没有生命，也就没有世界。没有矛盾的“世界”，不过是某些人的一种唯心主义的幻觉而已。

毛主席说：“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试想看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怎能没有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异呢？怎能没有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差异呢？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生活中仍然有差异的，例如办事情，有人进度快些，有人则慢些；有的人思想中唯物论、辩证法多些，有人则少些，……等等。说共产主义社会不再存在人民内部矛盾，那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关于矛盾的普遍性的原理的。为什么有些人不敢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呢？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坚持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而不知不觉地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矛盾是客观存在，你越回避它，你就越处于被动地位。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彻底地坚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英明地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不仅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使我国社会内部得到进一步的

統一和團結，從而造成了生氣勃勃的，國民經濟大躍進的空前繁榮的局面。可是，有人却認為毛主席的著作“不是理論，只是一些方針政策”，或者說“沒有形成一個體系”。這些看法都是極端錯誤的。說句實在話，我真不懂得這些人所說的“哲學體系”是什麼意思。如果“體系”是指資產階級的哲學體系，那確實在毛主席的著作中是找不到那樣的“體系”的。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哲學家，都想建立自己的“體系”，有一百個這樣的“哲學家”，就會有一百個以上的所謂“體系”。玩弄概念遊戲，這是西方資產階級哲學家的嗜好、慣技。這是唯心主義的東西。我們不要。其實從唯物論的觀點看來，宇宙只有一個，宇宙的發展有其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主觀辯證法與客觀辯證法是一致的。因此，我們認為：科學的、真正反映宇宙客觀規律的哲學思想，只能够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形成和發展，即在革命與建設中形成和發展。而毛主席的哲學著作都是我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和建設事業的概括與總結，是當代最系統最光輝的馬克思主義哲學。

偉大的實踐，必然產生偉大的思想，偉大的學說。我國人民自1958年以來高速度而又按比例地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偉大實踐，已經證明了毛主席哲學思想的光輝及其巨大威力，證明了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家。

二

毛主席的著作（也包括哲學著作）是為革命鬥爭的需要而寫的。毛澤東思想是在革命和建設過程同各種錯誤的思想進行鬥爭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如果說，毛主席的“實踐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那麼“矛盾論”便可以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法，也就是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宇宙觀。

“宇宙”二字，是中國的說法。中國許多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注意了這方面問題的研究，已有關於這方面的見解。例如“淮南子”一書，是漢朝劉安編寫的書，它的“齊俗訓”篇中說：“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又如二千多年前，“墨子”也講到這一點：“久，彌異時也；宇，彌異所也。”宇是指空間，宙是指時間，兩者合在一起謂之“宇宙”，意思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世界。人們對於這個客觀世界的总的看法，也就是宇宙觀。可見，中國古代哲學，也講宇宙觀。

毛主席的“矛盾論”是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宇宙觀，是對整個世界如何發展變化的总的說明，总的看法。毛主席的“實踐論”發表於一九三七年的七月，“矛盾論”發表於一九三七年的八月。不論“實踐論”，還是“矛盾論”，都是有的放矢的。大家知道，在我們黨內，曾經有一部分教條主義的同志長期拒絕中國革命的經驗，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個真理，而只生吞活剝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的片言只語，去嚇唬人們。另外，還有一部分經驗主義的同志則長期拘守於自己的片斷經驗，不了解理論對於革命實踐的重要意義，看不見革命的全局，雖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這兩種人的錯誤思想，特別是教條主義思想，曾經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期間使中國革命受到了極大的損失。毛主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正是針對黨內的這兩種錯誤思想、特別是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列寧寫過一篇著名的論文叫做“戰鬥的唯物主義”。這幾個字，鮮明地表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著作的這個最顯著的特點。“唯物主義本身即包含所謂党性，在對事件作任何估計時，務須正面而公開地站在一定的社會集團的觀點上。”我們從來公開說明：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切經典著

作都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的，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例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正是为了反对杜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奇谈怪论而写的。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也是为了反对马赫主义——最反动的主观唯心论而写的，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毛主席的所有哲学著作，也是如此。“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有的放矢的，为了澄清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混乱思想，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写的；同时，也是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锐利的理论武器。

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一切经典著作，都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当然也就不可能象编写教科书那样一章一节地来写。但是，所有这些战斗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整的哲学思想、哲学体系。即是说，把完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彻底地运用和贯穿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贯穿在一切实际工作中。从中国的哲学史上来看，先秦诸子的著作，不管是儒家的，或道家的，或法家的，都有它的哲学思想。甚至如公孙龙子带有诡辩性质的东西，也有他的宇宙观。都是“欲以其学易天下”。可是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如大家很熟悉的胡适这个典型的资产阶级的走狗，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大概‘天论’、‘解蔽’、‘正名’、‘性恶’四篇，全是荀卿的精华所在，其余的二十余篇，即使真不是他的，也无关紧要了。”据说只有这四篇东西象西洋哲学的写法，所以才称得上“精华所在”。这是胡说八道。其实，“荀子”还有一篇“成相篇”，运用通俗的文学形式（类似“凤阳花鼓”的）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荀子的其他著作，可以作为它的注解，都体现着荀子的哲学思想。资产阶级学者以为哲学著作一定要象西方资产阶级哲学那样，按照教科书式的什么“体系”来写，才称得上“哲学著作”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毛主席的一切著作，都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宇宙观。“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三大著作集中地反映了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特别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不朽的光辉的著作，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矛盾学说彻底地运用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而创造性地大大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理论、主张，已经在整风运动中，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在1958年以来的伟大的实践中，经受了考验，得到了证实。这个著作中所阐明的一系列原理，适用于今天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时代，也适用于未来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时代。

所以，我们说，哲学与我们的建设，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哲学，并不是神秘的东西。我国工农学理论、学哲学的成绩，证实了这个道理。例如广州中一烟厂工人学哲学，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以后，提高了思想，改进了工作，使生产增长几倍。这就打破了对哲学的神秘观念，说明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好处。工农学哲学也不是按照教科书式的程序去学习的，他们对于干巴巴的教科书式的东西实在不感兴趣。

三

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教导我们说：“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又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抱着正确的态度，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

論，是為着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因此，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這種態度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矢”，射中國革命之“的”。可是有許多同志不是這樣，不是為了革命的實踐，而是為了單純的學習，所以雖然讀了，但消化不了。不會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甚至有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上的某些個別字句看作是現成的可以包醫百病的靈丹聖藥。毛主席說，“這是一種幼稚者的蒙昧，我們對這些人應該作啟蒙運動”。看來，這在一九四二年說的話，對於今天某些人說來還是適用的。還有一種情況是，有些同志天天在講“聯繫”，實際上卻是講“隔離”；把箭在手里搓來搓去，連聲贊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願放出去。這樣的古董鑒賞家，我們也是不需要的。

我們今天學習、研究毛主席的哲學著作，一定要抱着有的放矢的態度。我們為什麼要學“矛盾論”呢？毛主席說：“這個辯證法的宇宙觀，主要地就是教導人們要善於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的運動，並根據這種分析，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矛盾論”。毛澤東選集。1952年版，770頁）對立統一的法則，是辯證法最重要的法則。我們學習“矛盾論”最重要的就是要學習、運用這個法則，去觀察、分析矛盾，並根據分析的結果，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毛主席從來就是這樣做的。毛主席的著作之所以正確、有力，使中國革命事業從勝利走向勝利，就是因為他一貫地堅持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性原則，善於分析中國社會的具體矛盾、具體的歷史條件，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所以能夠產生那樣偉大的力量。也正因为這樣，所以毛主席能夠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今天我講“矛盾論”，不逐章逐節來解釋它的內容要點，只是想來談談“矛盾論”的基本精神、基本思想。照我個人的理解，它的基本精神就是：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列寧強調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為的是要達到“理論和實際聯繫。”

要怎樣聯繫呢？也就是說，要怎樣運用矛盾學說、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呢？“矛盾論”中說：“一個大的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包含着許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有中國社會各被壓迫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有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各個反動的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複雜的。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兩方面，又各各有其特點，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們從事中國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個矛盾的總體上，即矛盾的相互聯結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從矛盾的各個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總體。所謂了解矛盾的各個方面，就是了解它們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種具體形式和對方發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關係，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後，又各用何種具體的方法和對方作鬥爭。研究這些問題，是十分重要的事情。”這段話，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為什麼要去分析矛盾的總體以及矛盾的各個方面，而且告訴我們怎樣去分析、研究。只有經過分析、研究後，才能得出解決矛盾的方法。

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這是毛主席一貫

的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思想。例如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一开头就提到：“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和敌人这两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却有着不同的内容。可是，我们许多同志往往用不变的观点来理解“人民”这个概念，不作具体的分析、研究。毛主席却不是这样。他彻底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矛盾学说，把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运用在一切方面。他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唯物辩证法有一条道理叫做：一切事物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任何一个哲学原理，都有它的具体事物做背景。哲学，唯物论，辩证法这些东西都是具体的客观事物的抽象，如果不与实际相结合，不具体地分析，不考虑它的时间、地点、条件，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其中的意思。这叫做历史观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毛主席非常重视历史，他的一切著作都有着鲜明的历史观点。如要具体分析情况，就不能离开事物发展的时间、地点、条件，即是说，不能离开历史。什么事情，只有根据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进行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具体的结论。毛主席要求我们研究中国的历史，不论是近百年的现代史和古代的中国史，也包括中国的历史人物，要求我们正确评价历史人物。为什么要强调历史观点？因为唯物论、辩证法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认识史的产物；离开了历史，不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宇宙观、方法论。要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要做调查研究。毛主席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原则，对于任何部门，任何工作都是适用的。这是二十年前说的，对于我们今天以及今后的工作仍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历史观点非常重要。这是有理论根据的。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宇宙观是怎样来的？是在人类的认识史中来的；各种不同的人对宇宙的各种不同的看法，加以概括归纳起来，就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宇宙观。人的认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科学文化技术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哲学时，要弄清一些基本原理、概念的精神实质。当然，宇宙观不仅是在历史的发展中概括归纳起来而形成的，而且是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例如，“矛盾论”中说：“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认识史是一种历史，宇宙观是一种理论，这两者关系到底怎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两者完全是统一的，理论的东西是从历史中概括出来的。没有历史，没有发展，就没有理论。

毛主席一再告诫我们，要使理论联系实际，要从实际中引出理论来。要怎样才能达到这个要求、这个目的？必须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凡事都要调查研究，反对主观随意性。因

此，要求我們在具体分析情况时，要做到三点：第一，要客观地看問題；第二，要全面地看問題，看到过去，也預见到未来，即是說要有历史观点；第三，要深入事物的內面，精細研究事物矛盾的特点。所以，我們要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引出规律、得出正确的認識来，就必须詳細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实践論”中說：“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內部规律性，就必须經過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就必须从感性認識跃进到理性認識。”这种“改造制作工夫”，是認識論的，也是邏輯学的。不学点邏輯，就不能透彻了解“实践論”。

毛主席在“矛盾論”中說，教条主义者不分析諸种矛盾的具体情况，因而不了解各种不同性質矛盾的區別，也就不了解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样一定会把事情办坏。例如說，大放、大鳴、大辯論、大字报的方法，就是发动群众的方法，就是唯物辯証法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大放、大鳴、大辯論同时也起着調查研究、分析綜合地弄清具体情况的作用。1957年、1958年我們运用这个方法开展了全党全民的整风运动，收效很大。大家回忆一下，1957年春天，資产階級右派利用我們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大放毒草。初期有些同志十分担心，害怕搞下去不得了。可是我們的党和毛主席却异常精通唯物論、辯証法，在1957年5月8日到6月7日这个期間，社魑魅魍魎、牛鬼蛇神也来“大鳴大放”，社毒草大长特长，其目的在于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鏟掉这些毒草。到了一定时机，矛盾充分暴露了。我們党看清了这场斗争的性質，掌握了矛盾的具体情况，认为資产階級与无产階級这一場階級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于是集中力量，实行反击，把右派打下去了。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告訴我們，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有非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有反馬克思主义的思想。馬克思主义必須在斗争中发展。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又說：“資产階級、小資产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讓他們表现，而应当讓他們表现，同时在他們表现的时候，和他們辯論，进行适当的批評。……不加批評，看着錯誤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們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評，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評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应当力求用辯証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說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評不能解决問題。我們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們必須謹慎地辨別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这是十分深刻的唯物辯証法的见解。要辨別香花与毒草，就必须具体分析矛盾的情况；有了这个分析，才能找到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1957年我們同資产階級右派的斗争是激烈的。真金不怕火。我們的革命政权是巩固的，我們的党在全国人民中享有无限崇高的威信，我們的人民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十分优越的，有无穷的生命力的。我們不怕右派分子“大鳴大放”。毒草只有社它們出土，才便于鋤掉。几年来的經驗說明，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报是一个十分有利于我們的事業的武器。在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特别是对待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應該好好运用这个方法。工农学哲学、学理論也用这个方法，立竿见影，收效很好。可是我們有些同志，还不知道这个方法就是辯証法，就是它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和发展。

辯証法是什么意思？辯証法一詞，是外国传入的，导源于希腊文，它的意思就是进行論

战，辯論，即以揭露对方議論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而求得真理的方法。两个人坐在一起进行辯論、論战，称得上“辯証法”，为什么在我們的国家里，几百人、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全民性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就不算辯証法呢？我們有些同志的脑子还受着教条主义的束縛，因而“騎在馱子身上找不着牲口。”我想我們要宣传唯物辯証法，就要宣传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这个道理。要具体分析情况，你就要去接触实际，去做調查研究，这样可以克服主观主义，克服某些人随便拿到一个教条、不管三七二十一到处乱套的弊病。

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人的認識也不断发展，对宇宙的認識也就越加深刻，因而可以不断发现許多新的东西。“新陈代谢”，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新的要出来，旧的要消灭，所以毛主席說“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革命者應該帮助新生事物的生长，做促进派，革新派。“新陈代谢”，是指物的道理，“推陈出新”則是人的功能。

知識的来源是什么？“实践論”中讲：“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証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認識而能動地发展到理性認識，又从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認識、再实践、再認識，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認識之每一循环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这就是辯証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这就是辯証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观。”这一理論告訴我們，学会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唯物論辯証法，應該采取边干边学、边学边用的方法，不能按照某些人說的什么“先精通后运用”的方法，因为人的認識是通过实践逐步提高的。“馬克思主义者承認，在絕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絕对真理的长河中，人們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性之和，就是絕对的真理。……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沒有完結，人們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認識也就永远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宁主义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認識真理的道路。”（“实践論”）俗話說：“吃一塹，长一智。”有了实践，就有知識。但是这个知識是不是真理，應該回到实践中去檢驗。所以說，我們做工作，要經常进行检查、总结。不断总结經驗，是不断提高認識的最有效方法。

毛主席是我們学习、办事、做人的杰出的榜样。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學問，來不得半点虛假。毛主席在“改造我們的学习”一文中，曾經把那种“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嘩众取宠之心”的人，作了极深刻的描繪：“墙上芦葦，头重脚輕根底淺；山間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是深有教益的。我們必須遵从毛主席的教导，刻苦钻研，不断地改造我們的主观世界，以适应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的事业。为了把我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們需要一支强大的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队伍，我們需要一大批能够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解释中国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問題的又紅又专的理論家。

毛主席的著作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典范，毛泽东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在今天高速度建設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全面地系統地来学习、研究、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我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当前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

論我国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

丘谷間

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消灭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以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要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呢？通过阶级斗争消灭阶级，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公式。

政权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根本问题。无产阶级一定要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退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全集”第30卷，第87页）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不是阶级斗争的终结，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而且斗争是长期的、激烈的、曲折的、复杂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民主革命的终结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也就是说，我国社会从此进入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领导着我国人民胜利地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结了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经验，从而丰富着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学说。

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国内主要的矛盾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条件的变化，国外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国内的主要矛盾则让位给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亦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我国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就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消灭资产阶级，以建成社会主义，并创造条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为了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我们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方面继续解决民主革命阶段遗留下来的历史任务（主要是进行土地改革的斗争，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另一方面则通过国家的力量，没收官僚资本，牢牢地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积极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1952年底，当消灭封建残余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规定了要在全国内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这条总路线是引导我国社会由当时的既有社会主义经济、又有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复杂的经济结构，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的完全正确的路线。

我国过渡时期社会有三种基本经济成

分：社会主义經濟、資本主义經濟和小农經濟。同这三种經濟成分相应的有三个基本階級，即工人階級，資產階級，农民階級。

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对我国的民族資產階級作了杰出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階級分析。毛泽东同志教导我們：我国民族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时期，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剝削工人階級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資產階級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国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矛盾的两面性。它既不同于劳动人民之間的矛盾关系，也不同于工人階級同帝国主义、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关系。劳动人民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非对抗性的矛盾。工人階級同帝国主义、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对抗性的矛盾。而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既有对抗性的一面（剝削与被剝削的关系），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因为資產階級中的大多数愿意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等）。在这两个階級的矛盾关系中，由于我們掌握了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国营經濟，再加上国际上东风压倒西风的有利形势，因而工人階級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既然民族資產階級具有两面性，工人階級又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我們就可以而且應該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来达到消灭資產階級、消灭資本主义剝削制度的目的。和平改造的方法，就是对資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們对民族資產階級采取这样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它既不同于沒收或简单的迅速挤垮的政策，同“階級調和”政策也是毫无共同之点；它是完全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是完全从无产階級的长远利益、社

会主义长远利益出发的极其坚定的階級政策。实践已經証明：采取这样的和平改造的方法，一方面可以利用資產階級的企业和人的力量为我們做事情，可以减少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社会生产力免受破坏，这样就有利于国民經济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順利进行；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改造企业和改造人結合起来，把資產階級分子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就能彻底地消灭階級。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資產階級和平改造的理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馬克思列宁主义階級学說的創造性运用和发展，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成功的重大創举。

毛泽东同志对农民問題，特别是对中农这一阶层的科学分析以及对中农的策略問題的新规定，也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貢獻。中农，作为劳动者，它倾向于社会主义；作为私有者，它又倾向于資本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如何正确对待中农問題，引导他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关于依靠貧农、巩固联合中农的原則，把中农阶层具体分为上中农与下中农，上中农又分为新上中农与老上中农，下中农也分为新下中农和老下中农。依据这个具体的科学的分析，毛泽东同志规定了把貧农和新、老中农中間的下中农这三部分人（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作为工人階級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依靠力量。正确地解决階級斗争中的依靠力量問題，是工人階級胜利进行階級斗争的重要策略問題。只有依靠應該依靠的力量，才能团结可能团结的力量，并有力地打击所要打击的势力。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过渡时期、特别是經過土地改革运动之后的农村階級情况，农民各个阶层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态度，明确地解决这个重要的策略問題，这样就有利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順利进行，就可以填平我国小生

产者的那个汪洋大海，从而限制、堵死了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也就更加有利于工人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斗争。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和平改造本身就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时期，我们同资产阶级有过几次激烈的、尖锐的斗争。一次是在1949年冬到1950年春，我们进行了打击资产阶级的投机倒把，稳定市场物价的斗争。这场斗争的意义是迅速停止了通货膨胀，使市场稳定了，物价稳定了，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另一次是从1950年6月起至1955年秋，通过加工订货的斗争，使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纳入国家计划，削弱了生产的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限制了资本家的剥削；破坏了资本主义体系，使他们不得不依靠国营经济，接受改造，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高潮创造了条件。再一次是1952年进行的“五反”运动。反对资产阶级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孤立、打击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完全违法户、基本违法户）。“五反”运动成绩很大，同样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准备了条件。在这个期间，又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了思想改造，批判了崇美、恐美、亲美的买办思想，对肃清帝国主义在我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有很大作用。最后一次是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上半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是从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开始，进而推动了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这场斗争，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即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些情况，都说明了，要消灭资产阶级，要摧毁他们的经济基础必然会遇到他们的反抗。和平改造就是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分子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都是阶级斗

争的一种特殊形式。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还包括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抗美援朝的斗争，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复杂的、激烈的、尖锐的斗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阶级斗争是否就结束了呢？有人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解决后，资产阶级失去了经济基础，就算阶级消灭了。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阶级的存在取决于这个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也就是说取决于这个阶级的经济基础。但是作为一个阶级存在，还有它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生活习惯，等等。因此应该彻底地打击和肃清这些东西才算最后消灭了阶级。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如果说，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方面的话，那么，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后，当然还要继续改造旧的生产关系，但是这个时候，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则主要反映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阶级斗争主要转到政治和思想方面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宣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

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阶级。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在经济战线上进行，而且要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进行，以达到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建成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极其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斗争象波浪的起伏一样，有时候高些，有时候低些，有时候表现尖锐，有时候比较缓和。这种斗争，要到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思想的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才会停止。实际生活，完全证实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1956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决定性胜利后，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失去了经济基础。这种情况引起了资产阶级内部新的分化，引起了左、中、右三种社会势力的重新改组。这个时候，资产阶级中的右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乘国际上修正主义思潮泛滥和匈牙利反革命分子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候，向工人阶级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使国内两个阶级的关系趋于紧张。随后，右派分子被打垮，资产阶级中间派在斗争中受到教育，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以及整风运动的胜利，国内阶级矛盾又暂时趋于缓和。1959年春夏之交，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候，国内外反动派拼命攻击党的总路线，攻击大跃进，攻击人民公社。这场斗争，在党内也得到了反映，这就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党活动。为了保卫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我们进行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政治思想斗争还是会继续下去的。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斗争是长期的。因为资产阶级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而同社会主义制度相抵触。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在我国表现尤为突出。这同我国的历史条件是有关系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均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结合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条件，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又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同时我们今天从事着社会主义建设，是为了创造条件过渡到共产主义。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时期中，还是存在着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除了要同国内外的反动派继续进行斗争之外，还有促进派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促进派坚决主张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以便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村中的贫农和下中农的要求，这是全国绝大多数人的要求），而保守派安于现状，不再前进，他们动摇于促进派和反动派两种势力之间，他们如果不前进到促进派的立场上

来，就有被反动派俘虏的危险。可见，这种斗争实质上是前进到共产主义或者倒退到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从这里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整个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毫无根据的。但是认为过渡时期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越来越尖锐的看法，也是不对的。因为阶级关系的状况不是孤立的，而是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息息相关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次重大的胜利，都必然引起国内阶级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工人阶级力量越来越大，资产阶级力量越来越被削弱，日益逼近死亡。这种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阶级斗争的规模、程度。当然，由于剥削阶级的阶级本性，他们在经济上失去阵地之后，不甘罢休，还会通过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的斗争，来进行抵抗；抵抗程度的大小，要看国际国内各种条件。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是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工人阶级取得彻底的最后胜利。这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认识和掌握这种规律，可以防止和克服“左”的或右的错误，从而正确理解党的政策、策略，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引向最后的彻底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不仅指出过渡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由他制定的关于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的学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对于保证无产阶级在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对于保证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并顺利过渡到共产主义，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有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也有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在这样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应该分清敌我，区别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不同的方法解

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同革命时期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的阶级斗争，有很大的不同。当前，我国两条道路的斗争，虽然还包含着敌我矛盾（例如我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以及同地、富、反、坏、右等反动派之间的矛盾），但是，更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同志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对待敌人，应该采取专政的方法，即用孤立、分化、惩办和镇压的方法去解决；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则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或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泽东同志把这一方法概括为一个著名的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只有按照这样的公式办事，才能正确处理矛盾，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同时，毛泽东同志还告诉我们：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里就告诉我们，应该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善于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根据矛盾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

毛泽东同志关于我国过渡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是我国人民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有利条件的有力武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的发展。我们必须学会掌握这一武器，坚决地站到阶级斗争的前列，正确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为彻底消灭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努力。

略論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与消費的关系

黃家駒

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与消費关系的性質

生产与消費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建設中的重要問題。馬克思主义認為，在生产、交換、分配与消費中，生产是起决定作用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保證供給。交換、分配和消費又会反过来影响生产。生产与消費的关系，往往反映出这个社会經濟的本質。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資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这个矛盾直接表现为生产与消費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取得高額利潤，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是增加資本积累扩大生产和加强对工人的剝削，結果劳动者貧困化，市场消費能力縮小，形成生产与消費的对抗性矛盾。經濟危机所引起的大量破坏生产力，才使生产与消費得到暫时的平衡。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与消費的关系却完全不同：第一，生产和消費都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共同的利益和愿望，反映人民要求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这两方面的一致性；第二，生产与消費是互相推动和互相促进的，这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手段的統一。发展生产是手段，滿足人民物質文化需要是目的；生产发展是为了消費的需要，而需要又不断向生产提出要求，推动生产发展。随着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逐步改善，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又必然大大提高，給新的生产高涨創造前提。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与消費相互关系发展的規律。

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与消費的这种一致

性，并不意味着它們两者之間不存在非对抗性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曾指出“在客观上将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間的矛盾，就需要人們时常經過国家計劃去調节。”这种生产和消費之間矛盾，反映了經濟建設中各种矛盾的一个很主要的方面。例如在經濟建設中，生产資料的生产与消費之間是存在着矛盾的。因此，我們要充分發揮一切潛力給生产部門提供更多的生产資料，又要使它的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一方面要使生产与消費間保持着一定的平衡，另一方面又要認識生产与消費之間的不平衡是經常的，必須經常加以調整。正確認識这些，才能正確認識和处理經濟建設中生产資料供应問題上的某些紧张現象。其次，在消費品的生产与消費中，也是存在着矛盾的。消費品在迅速增长；但是，由于就业人口的增加，工資的提高，农产品銷售的增加引起农村购买力迅速增长，等等原因，劳动群众的需要也迅速地增长了，这就会出现矛盾。再其次，在社会主义建設中，一方面国民收入不断增加，国家財政不断增多；但是，国民收入的增加总归有一定量，这样，在安排发展生产和滿足人民需要之間的比例上，也必然存在一定的矛盾。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与消費是根本一致的；但也存在非对抗性的矛盾。这种非对抗性矛盾，是随着社会主义經濟建設不断发展，生产关系不断变革，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变化发展的。經濟条件的变化，新的經濟条件的出现，使生产与

消費的非對抗性矛盾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因此，應該善于從經濟發展過程中觀察它的變化，尋求它的規律，正確處理兩者之間的關係，求得社會主義經濟高速度發展和人民生計不斷得到滿足。看不到社會主義生產與消費關係的一致性，把兩者絕對對立起來，這是不對的。那種認為我們黨和國家只顧建設不顧人民生計的改善，只顧“國強”，不顧“民富”，只關心物的生產，不關心人的物質福利的觀點，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和十分錯誤的；同樣，那種把生產與消費看成毫無矛盾，當生產與消費出現某些不平衡時就大驚小怪，甚至因而懷疑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觀點，也是錯誤的。

經濟建設中生產與消費的關係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的生產和消費是有計劃和按比例，計劃經濟對整個生產資料的生產與消費不斷作出合理的安排，並且保證最大限度地發揮生產的潛力。

但是，生產資料的生產和消費也并不象某些人想象的那樣四平八穩。一個生產部門的生產由於技術改革或突破了生產過程中某些薄弱環節，產量迅速增加，對原料的需求也增多了，勢必促使生產該原料的部門也要來個躍進。可見，國民經濟中不平衡是經常的。如果處理得當，這種不平衡不僅不會妨礙而且會促進生產的發展。個別生產部門如此，整個國民經濟也是如此。

生產與消費出現了不平衡，就要求國家經濟機關通過經濟計劃加以調節。計劃機關的任務就是要作好積極的平衡工作，調整生產與消費的平衡。毛澤東同志又說：“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過了一年，就整個說來，這種平衡就被矛盾的鬥爭所打破了，這種統一就變了，平衡成為不平衡，統一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事實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這種

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①

學習毛澤東同志這一指示，就可以澄清某些人的錯誤認識。例如，當經濟建設中出現某些原材料供應緊張的現象時，有些人就大驚小怪，甚至說國民經濟“比例失調”。他們機械地、消極地理解國民經濟計劃中生產和消費的關係，要求每種生產資料的生產都與它的消費剛好相等。他們從消極方面來理解平衡，把不平衡說成是“方向性”的錯誤。這種看法是根本錯誤的。我們所要求的是能不斷推動生產發展（也相應不斷滿足人民需要）的比例關係。各種比例構成是會變化的，絕不能孤立地、靜止地，更不能消極地看待生產與消費的關係。各部門比例關係的不斷變化，生產與消費的平衡不斷突破是可能的，而且在許多場合下還是正常的。衡量比例關係是否正常，應該從是否對高速度發展生產和相應滿足人民物質文化需要有利出發。

同時，正確地理解這個問題，有助於我們在處理國民經濟建設中生產與消費的關係時採取積極的態度。因為，如果認為生產與消費不應該有不平衡，出現不平衡就是“比例失調”，就會對經濟建設採取錯誤的收縮削減的做法。不用說，這是全國人民所不能允許的。

人民經濟生活中的生產與消費

在分析消費品生產與消費的關係時，不要把人們對消費品的實際需要和有購買力的消費水平混淆起來。社會實際需要是指與當前生產力情況相適應而產生的群眾對產品的要求。沒有新的產品，社會不會有新的需要，但新產品一經產生，群眾對這種產品的需要會馬上超越了其生產水平，因為一種新產品的生產，開始時總是少量的，因此只能滿足少數人的需求。生產發展使人們產生了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促進了生產的發展，

^①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第十二頁。

这样就形成了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如果处理得恰当，不仅不是坏事，而且能推动生产发展。

社会消费水平则是另一回事。它实际上是国民收入中归各人消费的那部分产品有计划分配的问题，它是受购买力所制约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消费品是通过商品流通来分配的，因此货币被利用来作为分配消费品的手段。而货币购买力是受国家计划控制和调节的，社会购买力的水平与商品生产水平之间是相适应的。认为人民的消费必然走在生产发展的前头，并且由此得出结论说经济生活会长期紧张，是没有根据的。

为什么说社会购买力受国家计划控制呢？社会购买力的来源不外下列几个方面：国家（国营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和支付给非生产企业及各种机关职工的工资；国家购买农产品而支付给人民公社和农民的货币量；社会福利事业及行政管理费。所有这些货币支出，除购买农产品的货币量由于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潜力较难掌握而有所伸缩以外，其他都是有计划控制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本身，也要求居民增长的货币收入与消费品生产的增长相适应。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例如，由于计划工作往往不可能完全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由于大跃进带来的基本建设扩大和就业人口增加以及因此而来的对于消费品需求的增加，等等，在经济生活中出现某些不平衡，出现一定程度的消费品生产赶不上购买力的需要，这是可能的。对于这些，国家完全可以通过一些具体措施加以解决。

高速度发展生产是解决生产与消费矛盾的正确途径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表明，社会主义既要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又要逐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既要保持较高的积累资金，又要不断增加消费资金；既要

保证重工业部门生产迅速增长，又要逐步使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特别是农业，轻工业部门逐步得到技术改造。所有这些，都反映出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这些矛盾，但同时也包含着解决这些矛盾的内在动力。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充分地利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有计划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充分采用和革新现有技术装备，改进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这就是解决上述矛盾的主要途径。只有高速度地发展生产，才能增加消费品的数量，从而提高社会购买力，才能不仅满足人民购买力不断增长的需要，而且进一步满足人们越来越多的实际需求。只有高速度地发展生产，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绝对值，使积累与消费资金都能较迅速增长。国民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生产资料生产与需要之间的不平衡，也只有通过加速发展生产才能解决。

我们党在高速度发展生产上有了丰富的经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一整套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充分体现了经济与政治相结合，党的领导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和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相结合的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党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内部的各种关系其中包括生产与消费之间关系的问题。只要生产迅速发展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就可以积极地加以解决。在经济建设中，党提倡积极平衡，反对消极平衡；在国民收入的积累和消费中，党提出在保证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适当安排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党提出了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原则，批评了把生产和生活对立起来的观点。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反映了对解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中的积极态度。这应当成为我们今后认识和解决这种矛盾的依据。

学习毛主席軍事思想

提高对民兵战略地位的認識

上校 陈 新

毛主席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但正确的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而且规定了服从这一政治路线的军事路线。我国民主革命斗争的主要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①毛主席在总结我国民主革命斗争的经验时，就把武装斗争列为中国革命的三个重要法宝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主席亲自领导军队和指挥作战，从战争的实践中，总结了我国革命战争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和军事思想，永远是指导我们加强军事建设、争取战争胜利的灯塔。

毛主席在1945年“論联合政府”一书中指出：“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拼命的反对人民战争。”^②

毛主席的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包括关于建设怎样的军队，和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对敌斗争。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发动全民武装，实行全民皆兵，这是人民战争的基础，是毛主席基本战略思想。我国人民革命战争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正是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战略思想，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结果。

民兵是全民武装最好的组织形式。实行民兵制度，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我们党从来就把民兵工作作为武装斗争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而民兵制度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执行的制度，在历次革命战争时期，都发挥了伟大的作用。

在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指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将地主“旧武装拿过来，是建设农民武装的一个方面。建设农民武装另有一个新的方面，即农会的梭标队。……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③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在井冈山创立红军，即是以大革命时期的农民武装为基础，逐步发展成为主力军、游击队、赤卫队相结合的革命武装。依靠这支革命武装，彻底粉碎了敌人多次的围剿。毛主席在1928年11月“井冈山的斗争”一书中指出：“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引者按：指当时的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这是十分难得的；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加上红军第四军的力量，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④1934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赤卫队、少先队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一九五二年版，第五〇七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一九五三年版，第一〇六四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一九五一年版，第三一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一九五一年版，第八四页。

与游击队在历次粉碎“围剿”的战争中显示了他们极其伟大的成绩，致使敌人惊为奇迹，成为敌人侵入苏区的绝大困难。”在土地革命十年内战的时期，红军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能够坚持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能够粉碎大于我们力量几倍、几十倍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围剿”，就是依靠这支群众武装力量配合红军而取得了胜利。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各根据地要普遍组织抗日人民自卫军，其中又分为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18—25岁）和基干自卫队（简称基干队，26—30岁）青抗先和基干队统称为民兵。民兵这一光荣的名字，即是从这时开始的，它既是民，又是兵。日本鬼子来了就打仗，就是兵，鬼子走了就生产，就是民。毛主席当时很重视民兵工作，他在1938年5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说：“和建立根据地不可分离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要从这种斗争中去武装人民，即组织自卫军和游击队。”①对民兵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毛主席给了很高的评价，他说：

“这个军队（引者按：指八路军和新四军）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②

在解放战争时期，民兵组织有了更大的发展，民兵所起的作用更为显著。在解放区成师成团的民兵参加人民解放军或者长期随军配合作战，直到最后解放了全国大陆。

建国十年来，在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民兵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特别是自1958年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之后，美帝国主义又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当时毛主席提出：

“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

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③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在短短的几个月中，随着人民公社的发展，实行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形成了全民皆兵的群众运动，民兵组织大大发展，民兵活动空前跃进，从而使民兵工作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发展。

解放十年来民兵在剿匪反霸、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维护社会治安、配合军队保卫海防边防、歼灭空降和沿海潜入的武装匪特、守护铁路等方面，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广东省的民兵十年来共歼灭空降特务十一批七十一名；去年我省各地民兵组织，就破获各种犯罪案件九万余宗，逮捕各种罪犯二万二千多人。

民兵不但在我国革命战争中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祖国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是一支主力军和突击队。毛主席指示：“民兵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④这一指示，说明了民兵的性质和特点。民兵不同于正规军，它是不脱产的群众武装，因此，民兵要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在搞好生产、学习、工作的基础上，实行劳武结合的原则，进行民兵训练等工作。1958年大跃进以来，广大民兵由于经过教育训练，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体观念，因而在民兵中贯彻了“四化”（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管理民主化），充分发挥了“四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一九五二年版，第三八五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一九五三年版，第一〇六三页。

③ 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9月间重要谈话，见1958年（红旗）第十期。

④ 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9月间重要谈话，见1958年（红旗）第十期。

組織”的作用，民兵是战斗队，同时也是一支效率很高的“产业軍”。揭阳县在1958年民兵师成立后，发动了37万民兵积肥和除四害运动，一天就积肥2千多万担，追肥14万9千多亩，捕鼠30多万只。化州县民兵去年种各种試驗田40万9千余亩，創造了許多高产纪录。今年三月汕头专区在以抗旱为中心的生产运动中，出动民兵122万余人，堵河、挖井、修圳27,500余处，受益面积达64万余亩，并由28万余民兵組成一万多个生产突击队，开荒53万余亩，种試驗田、丰产田100万余亩，办工厂1,400余个。在技术改革和文化进军中，許多民兵也当了尖兵。广州市医药采购站的民兵，在去年技术革新中，制造新产品30多种，价值7万余元。这些事实，都說明了民兵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設方面，同样起了巨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把民兵工作搞好了，我們就为应付突然事变作了准备，随时能够迅速的、有組織的由和平状态轉入战时状态，并在战争中坚持建設。我們加强民兵工作，还可以减少常备部队，为国家省出人力和財力来进行經濟建設和加强军队尖端科学的建設，完成现代化国防的任务。所以加强民兵工作，不但在国防建設上，而且在經濟建設上都有着深远的重大的意义。

在目前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积极准备战争企图侵略我国的情况下，在未来的现代化战争中，民兵的作用又如何呢？所謂现代化战争，就是导弹、氢弹、化学武器的战争，战争的破坏性、突然性、全面性更加大了，战争将会从空中、陆上、海上各方面打起来，在这样的现代化战争中，是不分前方和后方的。对付这样的战争，更要实行全民皆兵、全民战争。这样，加强了民兵組織，就能够有組織的防护，及时地組織群众轉移，可以担負抢救人員、物資，并支援、配合部队作战，維持地方治安等工作。同时，民兵可以迅速的組成大量的野战部队，歼灭敌人。总之，我們实行全

民皆兵，把全国每一个人民公社、工厂、矿山、学校、机关，都組成坚强的战斗堡垒，則任何敌人和原子弹都不可怕。毛主席說：

“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样新式武器。”^①“战争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②这样看来，越是现代化战争，就越要強調民兵的作用。因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靠人去掌握的。”^③这是馬克思主义者对于战争中人与物的基本观点。我們不但要看到现代战争的“原子条件”，而更应看到“人民条件”。帝国主义就很害怕我們的人民公社和全民皆兵。在毛主席的伟大軍事思想面前，在我国强大的民兵队伍面前，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承認：“中国打不烂了”；盘据在台湾的美国軍事顧問团人員也說：“中国现在民兵遍地，如果美国要和中国作战，上了中国大陆，就等于陷入了泥沼，真会寸步难行。”可见毛主席全民皆兵軍事思想的巨大威力。

有人說：“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民兵不起大作用了。”这种說法，是毫无根据的，是“唯武器論”的观点。馬克思主义者从来認為：群众是历史的創造者，因此群众路綫是我党进行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綫。实行全民皆兵的軍事路綫，正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群众路綫在武装斗争中的具体貫徹。讓我們高举毛主席軍事思想的紅旗，提高对人民战争、全民皆兵的認識，更好地加强民兵工作。

① 毛泽东同志1946年8月在延安接見美国記者安·路易斯·斯特朗所发表的談話。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一九五二年版，第四七四頁。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一九五二年版，第四三二頁。

否認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 必然會走向康德主義

鍾哲人

不能把“思維與存在同一性”
與辯證法的同一性對立起來而否認
思維與存在的對立統一

思維和存在的關係是不是對立統一的關係，這是關於思維和存在同一性問題爭論的實質，儘管有些同志故意模糊了爭論的焦點，把問題說成是“名稱之爭”，“唯心主義用語與唯物主義用語之爭”，“對經典著作詞句理解不同之爭”，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在這一大堆爭論問題中看到爭論的根本問題是思維與存在是否對立統一關係的問題。這是可知論與不可知論之爭，辯證唯物主義一元論與二元論之爭，唯物辯證法與形而上學之爭。說來說去，世誠等同志歸根結蒂是要否認思維與存在的對立統一。這一點雖然在後來的一些文章中由於他們的轉彎抹角，而有點模糊，但在世誠同志先前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義原理嗎？》一文中（以下簡稱為世誠的第一篇文章），問題是提得十分明確而尖銳的。在那裡，世誠同志是公開地、露骨地否認思維和存在有對立統一關係的。他說：“如果說‘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就是毛主席的在‘矛盾論’中闡述的矛盾的同一性，那麼，這就是說，思維與存在是對立面，思維和存在這兩個方面，在一定的條件下，互為存在的條件，共處於統一體中。那麼，思維與存在共處於一個什麼統一體中

呢？既然思維與存在這兩個方面互為存在的條件，互相依賴，誰也離不開誰，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這還能與唯心主義的‘原則同格論’劃清界限嗎？而‘原則同格論’的全部實質就在於宣傳這種‘意識和物’、‘物和意識’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的唯心主義的理論。”從這裡可以看到問題的分歧，觀點的對立是異常鮮明的。世誠同志認為有差別就不能有統一，有統一就不能有差別。思維與存在既然不是等同的，是有差別的，因此二者就不能是統一的。他只看到形而上學的“同一”而看不到辯證法的“同一”，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同一和差別無論如何也統一不起來，他不能“在對立面的統一中把握對立面”^①，片面夸大了思維與存在的差別性而否認了二者的統一性，否定了二者的對立統一關係。結果是割裂了思維和存在的辯證關係。世誠同志堅持的是形而上學，反對的是辯證法。王若水等同志對於他的這種形而上學觀點已作了有力的批駁。但世誠同志與其他一些同志在後來的文章中卻仍然堅持自己的形而上學觀點，他們還在利用一些被曲解了的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詞句，千方百計地維護這種錯誤觀點。世誠同志在他第二篇題為“試論唯物主義的反映論同唯心主義的‘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根本對立，乃是哲學上兩條基本路線的鬥爭”一文（以下簡稱

^① 列寧“哲學筆記”，第73頁。

世誠同志的第二篇文章)中声明对前文的“个别提法”作一些修改。作了什么修改呢?在这篇文章中,世誠同志开始提到了“主体和客体的統一”,他說:“辯証法的規律适用于一切事物,当然也适用于思維和存在的关系这样一个哲学根本問題”。大概世誠同志觉得他第一篇文章中的形而上学观点过于露骨了吧,必須用一些辯証法的詞句来伪装一下。可是我們在細讀了他的第二篇文章之后,觉得他仍然沒有放弃自己的錯誤观点。因为任何好听的詞句总是掩盖不了問題的实质的。在这第二篇文章中,世誠同志仍然宣称:思維与存在的同一性与辯証法的同一性是有原則区别的、絕對不能混淆的两个范畴。企图把思維与存在同一性与辯証法的同一性对立起来而达到否認前者的目的。站在与世誠同志同一立场的李唯一同志,在这个問題上更多的發揮了这个論点。他在“关于思維与存在的同一性”命題的探討”一文中,以折衷主义和調和主义的面目,坚持世誠同志提出的錯誤观点。他口头上也承認思維与存在有着对立統一的辯証关系,但接着他又拼命进攻辯証法和唯物主义的一元論,他强詞夺理地說,承認思維与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原則同格論”,就是“修正辯証唯物主义的認識論”;甚至有了“嵌入說”的象征。他最突出的一个論点就是反对把辯証法运用于認識論,反对运用馬克思主义辯証法对立統一的原理去分析思維和存在的关系問題。其錯誤性质是与世誠同志完全相同的。对于这一点,很多同志也作了批駁。这里我們再作一些分析。

“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命題与“矛盾同一性”有沒有联系?唯物辯証法对立統一規律是否适用于思維与存在的关系?这是我們的分歧所在。这个問題实质是:馬克思主义的辯証法能否运用于認識論?在馬克思主义哲学中辯証法与認識論是不是統一的?

对这些問題,世誠同志和李唯一同志实

际上都作了否定的回答。世誠同志說:“辯証唯物主义認為,尽管思維可以正确反映客观存在,可以对客观存在起到能动的革命的作用,但是思維和存在毕竟是有差别的,毕竟不是同一的。”(《哲学研究》1960年第三期,第50頁,着重点是引者加的)意思是說,思維和存在归根到底是有着差别的,因此不能是同一的,毕竟是没有对立統一关系的。思維与存在的同一性与矛盾的同一性完全是毫不相干的两个命題。李唯一同志說得更明白:“在分析特定範圍內的問題(按:指認識論問題——引者)时,是不能泛泛的,似是而非地将一般的原理(按:指辯証法对立統一規律——引者)硬套上。……不能因为所有事物都具有对立統一的最一般的規律,就把我們現在研究的特定的不同对象——思維与存在之間的关系,称之为‘同一性’。”(《哲学研究》,1960年第2期,第34頁)就是說,辯証法对立統一的規律虽則是“最一般的規律”,但在思維与存在关系这个問題的“特定范围”是不适用的。

我們認為这是对辯証唯物主义世界观极大的歪曲和“修正”!馬克思主义辯証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維发展的最一般規律的科学。辯証法不仅是客观世界发展的規律,同时也是思維发展的規律。馬克思主义辯証法毫无例外地适用于一切領域。辯証法、認識論、邏輯在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馬克思主义哲学認為,主观辯証法不过是客观辯証法的反映。思維的規律是客观存在的物質世界发展規律的反映。这是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已經明确地說明了的問題。恩格斯說:“思維規律与自然規律必然是相互一致的,只要我們正确地認識它們的話。”(《自然辯証法》,第187頁)在《費尔巴哈論》中,恩格斯又說,思維的規律和自然的規律“两个系列的規律,它們在本質上是同一的,在表現上是各异的,……这样,概念的辯証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

的辯證运动的自覺的反映。”（《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第48頁）既然自然規律、思維規律在本質上、內容上是一致的，因此，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三者是統一的。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在《資本論》中，邏輯、辯證法和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不必要三個詞：它們是一個東西〕都應用於同一門科學……”（《哲學筆記》，第233—234頁）。“辯證法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哲學筆記》，第364頁）世誠同志和李唯一同志為了替他們的“否認思維和存在的對立統一”尋找“論據”，竟然把存在的規律與認識的規律絕對對立起來，認為辯證法對立統一規律不能運用於認識論的“特定範圍”，不能用這個規律去說明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問題，這是完全錯誤的。

當然，思維規律和存在規律的統一並不等于說它們之間沒有差別。思維規律和存在規律在形式上是不同的、存在規律是客觀存在著的，而思維規律則是作為存在規律的反映在人們的意識中存在著的。“邏輯規律就是客觀事物在人的主觀意識中的反映。”^①它們二者在內容方面是統一的。馬克思主義正是根據二者在內容上的統一性而作出了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三者同一性的科學論斷。這樣，馬克思主義哲學就結束了過去舊哲學中本體論、認識論、邏輯分成獨立的互不相干三個部分的狀況而以它的原則統一性和完整性超越於過去一切哲學體系。辯證法、認識論、邏輯三者的一致性，使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為戰鬥的唯物主義，成為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最銳利的理論武器，在與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把辯證法、認識論、邏輯三者之間在表現形式上的差別絕對化，加以夸大，就會導致三者互相脫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則統一性和完整性就會受到破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戰鬥性也就必然受到削弱，而唯心主

義、形而上學就會乘虛而入。

不能把“思維和存在同一性” 與反映論對立起來

世誠同志為了論證“思維和存在同一性”只是唯心主義的原理，否認思維和存在的對立統一。在他的第一篇文章中，開宗明義便提出：“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義哲學原理，它與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反映論是根本對立的。”在第二篇文章中，他更集中地論證這個命題，并干脆把這篇文章的題目定為：“試論唯物主義的反映論同唯心主義的思維和存在同一性的根本對立，乃是哲學上兩條基本路線的鬥爭。”我們認為把反映論與“思維和存在同一性”對立起來是根本錯誤的。

首先，“思維和存在同一性”是哲學基本問題第二個方面的概括，而反映論則是唯物主義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和論證。把哲學基本問題和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對立起來，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正象把思維和存在何者是第一性問題與唯物主義對立起來一樣。而且這樣對立起來，必然會混淆可知論與不可知論的對立，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個陣營的界限也被弄得模糊不清了。如果說反映論與“思維和存在同一性”的對立是哲學兩條基本路線的鬥爭，那麼，否認思維和存在同一性的不可知論是屬於那一條基本路線的呢？承認思維和存在同一性的不僅有唯物主義者而且還有徹底的唯心主義，難道可以把這兩個根本對立的哲學派別都置於與反映論相對立的一方嗎？這樣不正是混淆了哲學兩條基本路線的界限嗎？

其次，承認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並對這個問題進行唯物主義論證正是反映論的前提。唯物主義哲學認為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維是第二性的，而且認為思維和存在有著

^① 列寧：“哲學筆記”，第169頁。

对立统一的关系。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是有差别的，前者存在于我们之中，后者存在于我们之外，但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思维和存在又是统一的。“观念的现象和物质的现象是同一现象的两种不同的形式”^①，二者相互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正因为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因此思维能够反映存在，主观能够认识客观。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反映论的前提。世诚同志把反映论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对立起来，根本否认了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样就把反映论的前提取消了。世诚同志一再声称他是在维护唯物主义反映论而反对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可是，由于他否认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把主观和客观割裂开来，他就不能不走到反映论的对立面——二元论和不可知论去。事实是这样的，如果思维和存在没有任何同一性，二者只有差别，没有统一，那主观和客观之间“由此达彼的桥梁”便被切断了，人的认识只能在思维范围内兜圈子而无法认识客观世界，客观世界不能反映到主观世界中。这还有什么反映论的影子呢？恩格斯说：“我们的主观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都服从于同一规律，……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整个理论的思维。它是我们理论的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②世诚同志正是在自己的思维中取消了这个前提，他企图在认识论中摆脱掉这个“统治着我们的理论思维的前提”，结果他不能不接受不可知论和二元论的“统治”。

世诚等同志不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无法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世诚同志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把主观和客观割裂开来，必然把自己引向不可知论和二元论。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否认思维和存在的相互转化，那就不仅否认思维可以正确反映存在，而且也否认思维对存在的能动作用。否认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当然就不会有什么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也谈不上意识的能动作用了。由于世诚同志否认思维和存在能够互相转化，由于他把反映论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对立起来，从而把辩证法和认识论分离开来，他就必然会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歪曲为形而上学的消极反映论。世诚同志不承认或不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意义和作用，因此他不能区别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消极的反映论。

尽管世诚同志在他第二篇文章中也引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很多关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话，但实际上，他是在混淆辩证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界限。他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从来都是，而且只是用反映论来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且只是用反映论来解决才是唯一正确的解决。”（着重点是引者加的）这是对经典作家的歪曲。我们知道，一切唯物主义者（包括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在内）都是用反映论去解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却与以前一切唯物主义不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它不仅承认思维是存在的反映，而且承认思维对存在的能动作用。辩证唯物主义不仅用反映论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且用辩证法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正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旧唯物主义认识论区别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同志称为“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规定”，称为“能动的革命反映论”。^③世诚同志把

①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351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22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5页。

辯證唯物主义認識論仅仅歸結為反映論，這不是對辯證唯物主义世界觀的歪曲嗎？

世誠同志又認為，思維對存在“……只要達到正確的反映，就會起到‘能動的作用’。”看來，世誠同志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這兩方面是更着重認識世界這一方面的。似乎只要正確認識世界就自然會能動改造世界了。實踐的重要作用在世誠同志的視野中消失了。而他还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到底經典作家們是怎樣論述這個問題的？

毛澤東同志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①

辯證唯物主义認識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第一次科學地說明了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地位 and 作用。列寧說：“生活、實踐的觀點應當是認識論底首要的基本的觀點。”^② 旧唯物主义者雖然也承認思維是存在的反映，但他們不了解實踐在認識中的意義。馬克思在批判費爾巴哈的形而上學唯物主义時說：

“他在‘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僅僅把理論的舉動看做真正的人的舉動，而對於實踐則只是在它的污穢的猶太人的表現形式上加以理解 and 確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意義。”^③ 世誠同志沒有真正理解實踐在認識中的作用，那就無怪乎他不承認思維和存在能夠互相轉化了。實踐是認識的基礎，是一切知識的源泉。人們在獲得了正確的認識以後，又怎麼能夠根據這種認識去變革現實？主觀的東西又怎麼能進入客觀？人們怎麼能夠變主觀的東西為客觀的東西？這也一點離不開實踐。只有通過人們的實踐活動，意識的能動作用才能表現出來。離開實踐，人們認識的活動是無法進行的，意識的能動作用是無從實現的。同時，看不見實踐在認識中的作用，主客觀之間，

思維和存在之間的相互轉化，也是難於理解的。把不可知論和其他一切哲學遁詞駁斥得最徹底的就是實踐。實踐也是駁斥否認思維和存在同一性錯誤觀點的最有力的論據。試想，人們在實踐過程中能夠實現了預想的目的，人們的思想、計劃、理論在實踐過程中變成了事實，主觀認識在實踐中與客觀規律相符合，如果思維與存在沒有同一性，怎麼能夠實現這種相互轉化？正是實踐在人的思維與存在之間，架起了一座永遠切不斷的橋梁，思維與存在在人們的實踐過程中不斷相互轉化，人們在這個不斷轉化過程中一步步地越來越深入地探索社會和自然界的秘密，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作用，改造社會，駕馭自然。

否認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必然會倒向康德主義

世誠和李唯一等同志夸大了思維和存在的差別性而否認二者的對立統一關係，結果必然走向康德主義。儘管世誠同志聲稱要“同康德的二元論劃清界限”，可是他如果不放棄這種錯誤觀點，即使添上很多“但書”，界限還是無法劃清的。

世誠同志否認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認為思維和存在不能處於一個統一體中，二者是各不相干，平行發展的。這必然會走向不可知論和二元論——康德主義的路綫。康德正是“把認識和客體割裂了開來。”^④ 他把物體，“自在之物”看作為在“我們之外的某種東西”，^⑤ 即客觀的東西，把物體的現象，“為我之物”看作為物體作用於我們的

①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91頁。

② “列寧全集”第14卷，第142頁。

③ 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見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版）。

④ 列寧：“哲學筆記”，第193頁。

⑤ “列寧全集”第14卷，第203頁。

感觉时而引起的表象，即主观的东西。而且他把“‘为我之物’与‘自在之物’根本分开。”^①康德认为“‘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它和现象有原则区别，它属于另一个根本不同的领域，即属于知识不能达到而信仰却能够发现的‘彼岸’领域。”^②既然他把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割裂开来，否认主观能反映客观，因而必然主张世界是不可知的。按康德看来，在我们之外的世界是一个神秘的世界，是人的知识无法到达，只能由信仰去发现的“彼岸”。对于康德哲学中的二重性——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倾向，黑格尔从认识论方面给予驳斥。黑格尔指出康德“把……主观与客观的对立扩大了。”^③（值得注意的是世诚和李唯一同志正是夸大了主观和客观、思维和存在的差别性而否认它们的统一性。）黑格尔批判了康德认为思维形式只是“供使用的手段”的错误观点，并“天才地猜测到了”“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

反映。”^④可是，黑格尔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对康德哲学进行批判的。正如列宁所说的：“黑格尔完全是而且纯粹是从更彻底的唯心主义观点”“去揭露了康德的二重性、不彻底性，揭露了康德的那种可说是在经验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动摇。”^⑤

彻底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二元论，第一次唯一正确地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谁想从辩证唯物主义倒退到康德主义，谁就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循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走去，我们将日益接近客观真理（绝不会穷尽它）；而循着任何其他道路走去，我们除了混乱和谎话以外，什么也达不到。”列宁这段话是值得一切离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人们深思的。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第98页。

② 同上。

③ 黑格尔：“小逻辑”第135页。

④ 列宁：“哲学笔记”，第166页。

⑤ 同上书，第153页。

广东哲学界座谈关于开展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

自从“哲学研究”等报刊开展了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以来，由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关系着哲学上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广东哲学界的重视，许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已经写出文章或酝酿参加这场争论。为了更好地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本刊编辑部于本月六日邀请了有关单位的代表举行座谈会，讨论了如何推动本省哲学工作者参加这场争论的问题。到会的有广州市各个高等学校哲学教研组的代表、省市委党校和省政法干校哲学教研室的代表、湖北大学广州函授站和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研究室的代表等三十多人。

会上，同志们就这一问题争论的实质、开展这场争论的意义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许多同志认为：这场争论是关于哲学上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与二元论、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之争，它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普遍性是否适用于一切事物等等哲学上的重大问题，也涉及到如何正确对待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这一问题的争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重要意义。通过参加这一问题的争论，可以更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并以此为武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其他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教学水平。大家一致认为：必须积极地参加这一问题的争论。而在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中，必须同学习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要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同时坚决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不同的意见充分发表出来，各抒己见，开展争鸣。还有些同志提出：当前开展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能只停留在概念上，而必须与当前的实践结合起来，从我国的伟大实践来阐明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

老子哲学的唯心倾向

刘 节

现在人把老子五千言当作一个人的著作，并且以为就是礼记曾子问篇所说的，“孔子问礼于老聃”，那位老子所写的东西。我认为这样说法是有很大的问题，恐怕距离事实太远。这里面的理由，我以前在“老子考”里已经提得很多；现在还要按照这一方向，加以补充。至于和孔子同时，是不是有一位老聃呢？孔子是不是向老聃问过“礼”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以为今本老子五千言的著作年代，是与老子五千言中的唯心底或唯物底倾向分不开的。虽然我们也可以放弃老子五千言著作年代这一论点不谈，而单独去研究五千言中的思想体系与其特性。不过作这样的研究，是离不开中国哲学史的系统而凭空乱说的。假使不凭哲学史系统，而悬空去谈某一哲学家的思想特性，是不是逻辑性要降低呢？我们到底凭什么理由，可以放弃哲学著作的历史性，而悬空去衡量这一著作作为思想体系呢？我以为这样作，对于某一哲学著作的真正价值会估量得不够正确。

一、老子思想出现的年代，与今本老子五千言是怎样出现的

说到先秦隐君子——老聃的生年，如果不以无稽的传说作根据，拿出可靠的真凭实据来，说他生在孔子以前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不能凭空相信在孔子以前一定有老子其人。多少总要拿出一些事实吧！就以“问礼”一点来作证，恰恰适得其反，老子并不看重“礼”，而且很菲薄“礼”。孔子为什么向一位最菲薄“礼”的人“问礼”呢？相信这一说的人应该拿出更多的事实和理由

来。馮友兰先生最近又作一些新的说明，虽然与我以前在“老子考”里所说的不完全相一致，对于老子不会见到孔子一点来说，是相一致的。我们不能够离开老子的思想而凭空信孔子以前确实有这样一位老子。至于象庄子天下篇所说的那位老子的思想在什么时候出现，与老子五千言一书在什么时候完成，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又当别作说明。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现在有人说：若是把老子的生年推后于孔子，把五千言的著作时代推后了，那就是有推尊孔子的意思。我以为这到没有逻辑上的关系。应该这样说：考明某一事实的真正是非，这才是尊重某一事实。这篇文章里对于孔子以前是否有一老子，不想谈。老子思想的出现年代是要谈的，五千言的著作年代也是要谈的。

先来说明一下，我以前曾经说过老子五千言完成于西汉文帝景帝年间，现在觉得这一说还要加以补充修正。我当时所说的，是指淮南子道应训以前的本子而言。因为这一说法，会叫人看作是指今本老子八十一章的著作年代而言。大体上说来，今本老子五千言，在韩非子解老，喻老两篇以后，淮南子道应训以前，应该已经有一个底子，所以有老子一书是出于文景之际的说法。现在所传河上公注老子，是晚出之书，唐朝刘知几早已怀疑过它。其次，津逮秘书本题严君平著的道德指归，那是更晚的著作了。据我看，现在所传的老子注本，没有早过于王弼的注本。（想尔注老子是别一系统，又当别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老子注四家，没有河上公本，也没有严遵本。到了经典释文叙录

里，才出现这两个注本的名称。有人说严君平的本子只有七十二章，王弼的本子原只有七十九章，这些说法都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我们不能据以为说。八十一章的分法，至少在汉武帝时可以出现，可能八十一章本是汉代早已流行的本子。因为八十一这个数目字在当时是很时髦的。邓平作太初曆，“其法以律起曆——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所以汉代曆家以八十一为“日法”。又说：“以终天之数为八十一。”后来的三統曆，也以一统为八十一章。老子之编为八十一章，正是与这个时代相近。宋朝的董思靖作道德经集解序。说：“老子，刘向定著二篇，八十一章。”这一说法必有所本，宋朝人可能依据刘向别录而说。虽然汉志著录刘向说老子四篇，但并未说出分章的数目，不能据以否定董思靖的说法。我认为八十一章的分法是很早的。从先秦杂抄式的丹书以来，经过韩非子的解老，喻老，直到淮南道应训以后的定本就是如此的。如果想尔注老子真是东汉晚期的作品，那末其正文与王弼注本比较，基本上相同，这也可以说王弼本就是今本老子五千言的最初定本。所以说老子五千言定本的编成，还应当推迟到汉武帝时代。不过在前汉，八十一章本不一定占绝对优势。可能与邻氏，傅氏，徐氏，乃至严氏的本子，都是并驾齐驱的。就道应训所引老子文句与八十一章的王弼注本比较，还有许多不可调和的不同，而且道应训与淮南各篇所引的老子，与今本还是有許多不同的。这就是一个反证。

现在就要问：为什么一定要争这个本子问题呢？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五千言中的思想看来很象系统整然，其实有许多地方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有些话好象是唯物的思想，又有些话好象是唯心的思想。例如：小国寡民的思想，应该是先秦以来就有的隐君子——老聃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与五千言中那些：“割斗折衡，而民不争。”“絕

圣弃知，民利百倍。”以及“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等等思想是相符合的，而且与庄子书中所见的老子言论也是相一致的。但是今本五千言中却出现下列一些话。如：“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又说：“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又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又说：“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又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同样的句子，又有：“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此外还有一些话，都可以看出是后来人加以修整的痕迹。如韩非喻老篇：“制在已曰重，不离位曰静。重则能使轻，静则能使躁。故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故曰：君子终日行不离辘重也。邦者，人君之辘重也。主父传其邦，此离其辘重者也。虽有代，云中之乐，超然已无赵矣！主父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无势之谓轻，离位之谓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轻则失臣，躁则失君，主父之谓也。”现在五千言本把它综合起来成下列几句：“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辘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以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这里最明显的是：“燕处超然”一句话与“超然已无赵矣！”的意义正相反。原来老子一定没有这话，这是今本五千言作者，根据喻老篇的话添补上去的；因此把“虽有代，云中之乐”两句也改为：“虽有荣观”。又把“君子”改为“圣人”，把“失臣”改为“失本”。又改“故曰”作“是以”，因而把上下文连接起来，然后有今本老子中这一段。再举一个例子。喻老篇说：“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脱；子孙以其祭祀，世世不辍。”今本五千言把它加两个字，又去三个字。文义便远胜了！试一读：“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

輟！”自知。

从上述各点来推論，今本老子五千言中的思想，是从先秦隱君子老聃的思想作基础，而逐步发展来的。到了汉武帝以后的本子中，便把小国寡民的思想压到次要地位，那些在原先不占重要地位的，为封建統治階級服务的思想，如說：“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与之爭。”这又显然是把“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与之爭”的思想作更为广泛的运用，但是与“小国寡民”的思想相比，就不能相容了。小国寡民的思想，在莊子馬蹄，肱僂諸篇中都可以找得到旁証，知道老莊是一家。象上面所举那些：“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的思想，究竟在先秦那一家的思想中可以得到反映呢？但是五千言中，这些话却成为中心思想了。这些中心思想正是西汉初年封建統治階級的枕中秘宝。黄老之学所以能在那时流行的緣故就在于这一点中心思想上。你們能說抱有“以无事取天下”的野心家真是歌頌小国寡民的隱君子嗎？小国寡民的思想当然是倒退的，反动的思想，主观的唯心傾向。你能說，“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的思想是唯物的嗎？我以为这也是唯心的傾向。所以說：“无为而不为”的社会哲学，与“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的認識論是如出一轍的，都是唯心的傾向。

先秦的哲学史体系不能不搞清楚。要来探討这个問題，莊子天下篇，太史公論六家要旨，淮南子要略訓，以及荀子非十二子，解蔽，天論諸篇中批評先秦各家的話，不能不認為是重要的参考資料。据我的看法，道家的思想是經過杨朱，宋鉞，慎到，莊周等人的思想洗煉之后，而逐步形成的。但是老子五千言中的話，其成份还不止于此。务須注意这样一个問題，即使承認先秦时已經有

老子一本書，也應該把先秦諸子中引到的，与今本老子大略相同的句子作一比較，到底是在那一处先出現的。这样比較，并不是不可能，而且一定有結果的。其中一些最明显的例子，我以前已經在老子考中举出来。那些在莊子各篇，管子內业，白心，心术諸篇，以及呂氏春秋許多篇里所見到的，好象是老子的話，为什么不称“老子曰”？又为什么有很大的出入？到底是引用象今本老子中的那些句子，而把它弄錯了的呢？还是今本老子五千言中那些話，原是根據这些所謂弄錯了的句子增改而成的呢？照我在老子考里所分析，以及在上文所举的那些例子，都可以証实今本老子五千言是根据先秦諸子中一些零散的句子增刪而成的。我們有必要在先秦諸子中辨析出老子的真面目来，然后才有可能說先秦隱君子——老聃其人的思想真面貌与真体系，从而与今本老子五千言作一明确的对照。例如淮南子要略訓說：“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是杨朱的主导思想。这样，便与呂氏春秋不二篇的“阳生貴己”，与管子立政九敗解的“全生之說胜，則廉耻不立。”的說法相合。这种思想，在呂氏春秋开头几篇，如本生，重己，貴生等处，都是闡明杨朱的思想。同时也使我們明白孟子所說的：“杨子为我，是无君也”的說法是一种曲解。貴生之說，應該是战国晚期很流行的思想。但是今本老子第七十五章上說：“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賢于貴生！”看了这两句話以后，难道不会感觉到是在批評“貴生”的学說嗎？难道在孔子以前，貴生說未出現以前就会出现这种批評嗎？

今本老子看来是系統整然，自成一套。与語录式的論語相比，确乎是首尾相应。有人說：第一章看作是全书的綱領，也未尝不可。可是論語一书的編者，其做法就与老子五千言的編者的做法大不相同。論語一书的編者把那些与孔子思想相矛盾的东西，都給予那些批評孔子思想的人所有。例如說：

“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就表明孔子不是这一类人。所以農門者批評孔子說：“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孔子答复樊迟的話却是：“我不如老农”。“我不如老圃。”而荷篠丈人批評孔子，就說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样針鋒相对，其对立面就非常之鮮明了。今本老子五千言中的思想，看来很象是“渾而为一”的，其实不然。如果真的把它当作“渾而为一”的思想，那就要上当。我以前也把莊子天下篇：“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两句話当作最基本的，先秦隱君子——老聃的思想。要想在今本五千言中找“太一”，却找不到了，而找到了“抱一”的思想。我在老子考里已經說过，“抱一”的思想是见于宋鉞一派，莊周一派的著作里。我們如果認为“太一”的思想是真正老子的思想，那“太一”与“太极”就很相似，都是绝对观念的“道”，不能不是唯心論。至于“抱一”，不曉得抱的是什么“一”？如果仍旧是“太一”，那还不一样是唯心的傾向嗎？再退一步說，那是孔子的“一貫”，孟子的“一本”，这两位都是唯心論，那也是唯心傾向的“一”了。再在今本老子去找，如果是“混而为一”的“一”，那就是唯心論；如果是“万物得一以生”的“一”，可能是唯物論；如果是“道生一”的“一”，那就是唯物論了。据我看，照今本老子五千言的全貌去理解，應該是“万物得一以生”的“一”，这是客观唯心論的傾向。所以說：“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如果是真正的唯物論者，不應該說“生于无”。因为客观规律的“道”不是“无”，仍旧是“有”呢？而且你能說：“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的“圣人”会是一位唯物論者嗎？因此我們觉得对于老子五千言的著作年代是必須辯論的。就因为其中的思想不是凭空而得的，要考求这些思想是怎样发展来的，經過这一番

仔細的討論，才曉得老子五千言的思想与客观唯心論是很近的亲戚，与唯物論的关系却很淺薄的。

二、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派別中看老子五千言中的唯心傾向

老子五千言这部书在孔子以前出现，与在孔孟思想以后出现这个問題，在写中国思想史的人看来，是一个关键性的問題。孔子以前，如果真有象庄子天下篇中所說的老思想，而孔子居然沒有受他的影响，那就不在情理之中，更不必說今本老子五千言了。象孟子这样好辯的人，对于杨朱，墨翟的思想，拿出全身的力量去打击他們；居然能对老聃的天道观，相安无事，熟視无睹；世界历史上会真有这样的事情嗎？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正好說明了上述这一問題。不只是今本老子中的思想，就連庄子天下篇中的老子思想，不只是孔子未曾接触到，恐怕連子貢也沒有接触到。再說：曾参是孔子的入室弟子，他也只有用“忠恕”二字来解释孔子的“一貫”。分明是說，孔子的“道”，原不过是“人道”而已，既不是西周以来就有的，宗教性的“天道”；更不会有五千言中，帶有客观唯心傾向的“天道”了。自从今本老子五千言出现以后，历史上的大学問家，沒有不接触到的，欣赏这一本哲学詩的人真是多得很。为什么，从孔子到孟子这一时代的人，对于这样珍贵的著作会熟視无睹到这样地步呢？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把庄子天下篇里所說的老子思想摆在孟子以后，这个問題就容易解决了。

孔子所說的道，还只是人生观方面的“道”，曾子用“忠恕”二字去闡发牠，就很深刻了。孔子所說的道，既然是“人道”，是“常道”，未能深入探討到“自然哲学”底“天道观”，更談不上什么是“自然规律”。但是今本老子居然有“道法自

然”一句話。又說：“希言自然”。“以輔万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可見老子五千言中的“自然”，還不能認為就是今人所說的自然界的規律。”說有些同志的說法，“自然”，也不過是“天然”的意思而已。更不能肯定“道法自然”一句話就是唯物的思想。更要探討自然二字的來源。我以前也說過：莊子天下篇中所敘述的“老子思想，是最樸素的先秦隱君子——老聃的學說。”又說：“在這一基礎上，經過楊朱，孟軻，宋銜，慎到，乃至於莊周，才孕育成今本老子五千言里的思想”。“道法自然”的思想，應該是出於慎到一派。正是莊子天下篇所介紹的：“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所以又說：“夫塊不失道”。既然是“土塊”也不失道，當然有“道法自然”的傾向。這在慎到一派的思想上是唯物論，可是一到老子的思想里，就不一定是唯物論了。因為客觀唯心論者也把道作自然規律看的，不過這種規律是“絕對觀念”。這才是“玄之又玄”的“眾妙之門”，所以“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韓非在大體篇上也說：“守成理，因自然。”這種“理”就是“道法自然”的“理”了。老子書中的“自然”一觀念應該是很晚出的思想，而且到了老子五千言中也已經變了質。

我覺得老子五千言中有許多句子都可以找到來源的，找到來源之後，再去分析牠的原來意思，與後出意思作一對比，對於辨明老子思想的唯物傾向或唯心傾向是很有用處的。例如今王弼本老子第四章：“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在這一段話的最後兩句，據我的看法，是取之於莊子的。或者這樣說：是以莊子大宗師篇的“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以及繕性篇的“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兩處簡練而出的。而且：“道沖而用

之”的思想，正是莊子的思想。這就是德充符篇所謂：“游心於德之和”。“使日夜無却，而與物為春”。因此今本老子里又有“沖氣以和”一句話。但是老子的話更該括而有詩意。其次如王本第二十一章：“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這一段話據我看也是取材於莊子的。應帝王篇：“其知情信，其德甚真。”又大宗師篇：“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這裡的“情”字，事實上就是“誠”字。先秦諸子中本有此用法。如墨子尚同下篇：“中情將欲為仁義。”“中情”就是“中誠”。也有作“中實”的，例如尚賢下篇作：“中實將欲為仁義”。古書上“誠”作“情”的地方很多。孫詒讓墨子間詁中大體上都已經舉出來。我們只是證明：“有情”是古義，到可以作實事解。如果變作“其中有精”，那就有抽象的傾向了，不一定是古義。但是老子這一句在淮南子道應訓上已經作“其中有精”，可見這是從莊子到淮南子一階段中出現的事。又如大宗師篇說：“善妖善老，善始善終！”這句話到了今本老子里變為：“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把“善”與“妖”對立起來與“奇”與“正”相比，說出牠們之中的辯證關係，顯然與莊子的“善妖，善老”的意義不同。而且“妖”字釋文所引本一作“夭”，就是“桃之夭夭”的。有幼少的意思。與“善始”的意義正相合，這是與“善復為妖”的意思恰恰相反的。“善復為妖”的“妖”，應該就是人間世篇所謂：“為聲，為名，為妖，為孽，”的“妖”。今本老子五十八章正是把兩處的“妖”字的意義綜合起來說的。如果：“善復為妖，正復為奇”的思想在前，其中作為核心的辯證思想，莊子決不會把牠拋棄掉的。就是從老子書里看來，他們對於“老”一概念是採取否定的態度的。正相反，對於“夭”的概念，到是肯定的。第三十章說：“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就是說凡一切

物类老了，就不能够生长了，这叫做“不道”；比之那“夭矫”有势的“婴儿”，其生命就差多了！所以说：“圣人皆孩之”！又如德充符篇说：“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为最之哉？”这个“最”字，过去人解释为“聚也”。“物何为最之哉”，就是“众人何为群而从之哉”？但是到了老子第四十九章，便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分明是批评“常心”，但把“常心”解释为“百姓心”。有人就以为这是从“唯心”走向“唯物”。其实“常心”是从“百姓”那边归纳出来的“心”，所以其主要方法是：“以其心得其常心”，好象我们所说的走群众路线一样。这就是孟子所谓“善推其所为而已！”其实今本老子第五十四章说：“知和日常，知常日明，益生日祥，心使气日强！”这里就更显出与孟子的见解有相似之处。孟子说：“持其志，无暴其气”。这还不是“心使气”吗？而且老子第五十二章又说：“见小日明，守柔日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习常”。所谓“习常”者正是习其常心，原是“以其知得心”的效果。孟子，庄子都是唯心论，这种“心使气”的方法是不是唯心的方法呢？我以为是唯心的方法的最突出的一面。也就是孟子的唯心哲学之最为特色的地方。我也认为庄子所谓“常心”，今本老子把牠进一步解作“百姓心”是一进步，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是唯物论。“守柔”的思想，自然是先秦隐君子老聃的思想。今本老子却把“守柔”的基本原因解作“心使气”，这恐怕不是老子的原来意思吧？而且也不是庄子的思想，而是孟子的思想。

今本老子思想，不只是有袭取孟子，慎到，庄子各派的地方，而且也有取之于宋钐，尹文一派的思想。“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是孟子书里的话，但是今本老子讲到“婴儿”，讲到“赤子”，讲到“孩”的地方也有好几处。现在就要

问：这种“专气致柔，能婴儿乎？”的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从宋钐一派手上传到庄子，再从庄子的手上传到今本老子。管子心术篇说：“能专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问于人，而自得乎于乎？”在内业篇里作：“能搏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诸人而得之已乎？”又说：“搏气如神，万物备存。”在这里得到“专气致柔”一语的来源了。这种思想到了庄子庚桑楚篇的卫生之经里，便变作：“老子曰卫生之经：‘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能儻然乎？能侗然乎？能儿子乎？儿子终日噪，而嗑不嘎，和之至也；终日握，而手不挽，共其德也；终日视，而目不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在这里所谓卫生之经一大段，虽出于老子之口，但只能算作卫生之经，还不是老子的话。到了今本老子便分作两处，成为老子所说的话了。其原本是出于内业，心术诸篇。可见“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以及“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都是出于卫生之经，若考其来源，与孟子，宋子的思想都有关系的。你能说：“专气致柔”与“营魄抱一”这样不可捉摸的思想不是唯心的，而是唯物的吗？其次，有些话原出于宋，尹一派，今本老子所没有，而出于古本老子的。例如韩非解老篇说：“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败，得之以成。”这四句见于管子内业篇的作：“人之所失以死，所得处生；事之所失以败，所以成也。”这两以所说的话都是解释“道”，可是内业篇的话，就说得周到合理。难道是解老篇引的有错了吗？我以为不是的。因为解老篇对于这四句，可以说是有解释的。那里说：“道譬

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這還不是正就四個“得”字作解嗎？我們試試在今本老子里能找得到“少得道”與“多得道”或“適得道”的分別嗎？所以我曾經說，解老，喻老，并非佳解，佳喻。就此可以證明在戰國後期，即使已有老子一書，這本書也很不整齊劃一。又如上引用“水”來比喻“道”一點來作証，也與今本老子的說法大相徑庭。簡直可以說，作解老，喻老的人對於“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等等說法都沒有看到的。馮友蘭先生精于中國古代哲學史，也以為今本老子五千言，至少在作莊子天下篇的時代是已經出現了的事實。事實上恐怕還不如如此。

先秦哲學史中可稱為有唯物主義傾向的哲學家，得到今人公認的，只有荀卿、韓非兩位。因為他們師徒二人的自然哲學與社會哲學，都能够按照唯物的觀點去闡發。荀子的“天論”，不只是把“天道”看成是自然發展的規律，就是“人道”也是社會發展的規律。荀子說：“天行有常”。他是把“天道”叫做“天行”的。所謂“常”，也就是老子所謂“常道。”所以說：“循道而不忒，則天不能禍”。因此我們把“天行有常”解作“天道有一定規律”，這是唯物論的“道”，但是老子的道是“非常道”，就不能夠算作唯物論的範疇以內的“道”了。荀子在解蔽篇里正是把“道”與“非道”對立起來說明問題。於是說：“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心是什麼呢？又在正名篇上說：“心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心”不過是行“道”的“工宰”，那個“道”却是客觀的事理。所以天論篇又說：“萬物為道一偏。”如果“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因此在儒效篇又說：“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君子之所以道也。”這種

“道”是“人道”，也就是“常道”，與老子書中所歌頌的“非常道”是不相容的。荀子既然是唯物論者而提出“常道”，把“天行有常”看作自然界規律，那末老子所謂“非常道”不會又是唯物論，不能算是自然界的規律。

荀子所說的“道”是自然界的客觀規律，韓非所說的“道”也是自然界的客觀規律，所以他們二人都是用“理”來解釋“道”的。荀子說：“道也者，治之經理也。”韓非解老篇在解釋“道可道，非常道”二句時，正是用“理”來解釋的。他們所說的“理”與孟子所謂“始條理”與“終條理”，以及“理義之悅我心”的“理”大有不同。解老篇說：“凡理者：方圓，短長，羸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謂常。”又說：“无定理非在于常，是以不可道也。”這裡的“不可謂常”一句，恐怕是“不可謂非常”，其中奪一“非”字。否者便與下文：“无定理非在于常”一語有矛盾。總之唯物論者所說的“道”，必定是有“理”可求的。所以韓非大體篇上說：“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這與荀子天論篇的見解是一致的，都是唯物論。又在主道篇上說：“道者萬物之始”。沒有象今本老子里所說的：“无名天地之始。”總之，“道”是有理可說的，所以解老篇又說：“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我們如果把這些話拿來同今本老子所說的“道”相比，那末老子所說的“道”決非唯物論，而且并無唯物的傾向。老子所說的“道”，是“自古以固存”的。這很相當於我們所說的，客觀的絕對精神。今本老子正是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這裡雖然也提出“物”

来作解释，但是老子所謂“物”，是怎樣的一種“物”呢？原是“視之不見”，“听之不聞”，“搏之不得”，却是“混而为一，复归于无物，”的所謂“物”。这个“物”是“綿綿若存”，而用之不動”的。这与韓非他們所說的，“理定而后物可得道”的“道”有絲毫相同之处嗎？今本老子对于“道”的描述，都是采取很抽象的話，很不确定的話。例如說：“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把这样話拿去同有定理”的“道”相比，岂不是距离很远嗎？因此我說：荀卿，韓非所說的“道”是唯物論，而今本老子中所說的是客观唯心論，是抽象的絕對。是一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后，”的，是“玄之又玄”的“絕對性”的道。我們認為解老，喻老兩篇作者是唯物論，今本老子的思想是客观唯心論。只能說：老子所謂“道”，是客观存在的“絕對”，是“无名之朴”，是一种“沒身不殆”的东西。他們所謂“物”者，是有特殊意义的。今本老子一方面說：“天乃道，道乃久”。又說：“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都是对于“絕對性”的“道”的描摹。

我們为什么說庄子天下篇所謂：“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是早期的老子思想？因为这种思想在今本老子里不见了。却在呂氏春秋里找到了相近的叙述。呂氏春秋大乐篇里有几句话，簡直是把“太一”的思想与今本老子論“道”的話造成一个桥梁。太乐篇說：“道也者，視之不見，听之不聞，不可为状。有知不见之见，不聞之聞，无状之状者，則几于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謂之太一”。今本老子也把这一段話分为几处，而且把“太一”这个名詞干沒了，改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还不明显嗎？今本老子第十四章：“視之不见名

曰夷，听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为一；其上不愧，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謂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隨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又在第二十五章上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如果在太乐篇以前已經有这样好的兩段妙文，太乐篇的作者必定不肯放弃。而事实上可以很明白的看出来，这是今本老子采取了太乐篇的話而加以增改的。把“太一”变省成“大”，还不算明显的証据嗎？但是“太一”之說为老子学說的主要成份，为什么今本老子把它放弃掉呢？我以为是有原因的，恐怕与儒家的“太极”一观念混同起来。这虽只是一种推測，但是值得考虑的。

再其次，小国寡民的思想与法后王的思想也是不并立的。荀卿，韓非二人都主张法后王的，都認為社会是进步的，后来居上。也就是說他們的宇宙观与社会观是相一致的。今本老子就大不相同了，頌古非今，反对进步，歌頌小国寡民。并且說：“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因此就打定了“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念头。若照馬列主义的理論，这种倒退的思想，自然是唯心的，而且这种唯心的社会观原是行不通的。所以史記貨殖传序一开头就引出老子的这种见解加以批評說：“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則几无行矣！”就是說：这种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历史的車輪，沒有法子可以使之倒退，唯有因势利导，使之納入正軌。而今本老子中居然出現这种倒退思想，还能說他是唯物主义的傾向嗎？

一九五九，十一，六。

短論与隨筆

“支援”解

于 厘

“支援”之所以需要“解”，是因为实在有一“解”的必要。在今天，“一人有事，万人相帮，一地有事，八方支援”已蔚然成风，“支援”有了它的新意义和新内容，这是一。还有一些人，一事当前，先从本人、本单位的利害得失出发考虑，对“支援”并不见得怎样自觉，这是二。我根据这两点理由，不怕浅陋，试作“支援解”。

倘若“支援者，邻里相助之謂也”这一释义还是符合于时代精神的话，则我另作“支援解”，那就属于舞文弄墨之类，半点意义都没有了。问题是一本辞源不能用到老，词意随时代而变。若果“支援”仍作如是解，那就远离现实社会的实际了。现在“支援”的涵义，显然不能只限于“邻里相助”的狭隘意义。互相支援不仅是一种新道德，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不仅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新型的生产关系，而且是一种共产主义风格。支援的出发点是为了共同发展，共同提高；为了共同事业的胜利和共同理想的实现。

在伟大的、全民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人们的共产主义精神闪闪发光，不计报酬，不讲条件，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先进帮助落后，工业支援农业，城市支援农村，成为人们的自觉性行动，就是基于人们对“支援”有了共同的新的认识。在企业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生产单位与学校、科学研究机关之间，条条和块块之间等一切方面，互相协

作，互相支援，成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鲜明特点，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这种支援和协作，内容将不断增加，形式层出不穷，也是基于这一原因。

“支援”既作如是解，那么，一些被陈腐观念禁锢了头脑的人，对今日的“支援”抱着“支援是人情，不支援是道理”，就不能说是懂得“支援”了。原来，在目前的条件下，我国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还没有消灭，反映这三个差别的资产阶级的法权残余影响还没有肃清，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在一些人的脑子里还相当牢固，或隐或现，这就影响其对“支援”“协作”的自觉性。例如，科学支援工业四化，支援农业技术改造，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这不仅是城乡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科学工作本身的方向和需要，不少的科学工作者都积极主动地投身到一浪接一浪的技术革命的洪流里去；不少科学部门与企业、公社和工厂挂上了钩，互相支援，互相协作。但是，也还有少数人对这种支援不是那么热心。他们口里不说，心里则认为：“支援农业技术改造是人情，坐在研究室里研究是正业”，“工农业技术没有多大搞头，总不若学校、研究室的高、精尖”。揭开盖子来看，不外是从本人、本位的利害得失出发，本质上还是那个“为科学而科学”的资产阶级腐朽的意识形态在作怪，或者是它的化身；而这种腐朽的

东西，又是以资产阶级的“利润观”做基础的。

其实，只要摒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利”，从集体主义的“利”社会主义的“利”来考虑，科学工作支援技术革命是“大有利可图”的。再重复一遍老道理：生产是科学的目的，生产实践是科学知识的源泉，是检验科学技术标准。科学的发展动力，不是“定理”、“概念”的逻辑发展，而是社会生产不断向科学提出的要求。若果誰认为科学研究与当前的生产无关，誰认为“工农业技术革命沒搞头，不若学校、研究室的高、精、尖”，那么，請听听最伟大的科学家恩格斯的话：“如果說，象你所断言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状况却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了。社会方面一旦发生了技术上的需要，則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数个大学更加把科学推向前进。”这是千真万确的至理名言。以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装备生产部門，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是全民的愿望，“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做工不靠两只手，运输不靠两脚走”是劳动人民迫切要求实现的理想。在我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決定性胜利和实现了两年連續大跃进的今天，这种理想

和要求更加迫切了。由于“社会方面一旦发生了技术上的需要”，伟大的城乡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就沿着正确的科学的軌道，形成全民性运动，风起云涌，发展猛烈。在这个一环扣一环，一浪接一浪的运动中，群众的革新和創造，日新月异，新的、高的、精的、尖的科学研究的课题，层出不穷，給科学研究指出方向和提出任务，科学工作者根据技术革命的需要，把当前生产的需要和长远需要结合起来，自觉、主动、积极地支援工农业的技术革命，一方面虚心向群众学习，一方面給群众以理論指导，科学地总结、提高群众的革新和創造，科学研究工作就有了坚实的基础、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前途，这还不是“大有利可图”嗎？

若果看到了资产阶级的“利”的一面，还应该看到“害”的一面。要是誰死抱着“为科学而科学”的观点不放，就必然放弃了科学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崇高目的，目的性不明确，就会离开当前最重大的斗争——技术革命；离开当前的斗争，就会离开政治，离开党的领导，其害处实在是不小的。

不怕浅陋，試作“支援解”，其目的就在于此。

广东经济学会通过今年工作计划

决定举办政治经济学講座

广东经济学会于三月二十四日举行理事会扩大会议，通过今年工作计划，决定以学习、研究、宣传毛泽东同志的经济理論为中心，开展经济理論的宣传、研究工作。其中包括：按照社联统一举办的“毛泽东思想講座”计划，負責举办政治经济学講座，举办各种学术討論会；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潮的批判；組織力量进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若干問題以及经济理論常識的通俗讀物的編写工作；广泛发动会员和組織经济理論工作者撰写論文，积极筹备今年十二月間召开的第一届年会，并为迎接明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四十周年的紀念进行准备。政治经济学講座，主要内容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論問題，其中包括：①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論；②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問題；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問題；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速度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⑤論以工业和农业并举为中心的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針；⑥人民公社若干問題；⑦政治挂帅与物质鼓励；⑧经济建设与群众运动；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⑩社会主义的商业問題；⑪社会主义的財政問題；⑫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問題。



迎接文教战线的群英大会

广州各高等院校热烈展开科学研究活动

广州各高等学校将于五月初旬分别召开群英会，为省和全国文教战线群英大会的召开作好准备。目前各校师生正鼓足干劲，大力展开科学研究，作为对红五月和群英会的献礼，并将同时深入进行教学革命。在五一节以前，中山大学中文系将完成“广东十年文艺思想斗争”等研究项目十多个。历史系要完成十六个，其中有针对向钺同志对毛主席著作的态度和修正主义观点的批判，内容以明清史及我国近代史开端问题为重点。此外，有一部分教师还将参加关于侯外庐同志对中国古代土地制度问题的讨论。华南师范学院科学研究活动也很紧张，在三月底有不少单位修改了本年度的科研计划，如政治系原定在五一节前完成三十多个研究项目；现在追加到六十个，历史系在五一节前要完成“批判向钺的修正主义历史观点”等三十多个研究项目。中文系则要完成“毛主席论继承与革新”等三十一个项目。教育系要完成四十二个项目。随着科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各系将于4月底分别举行科学研究和教学改革展览会，检阅战果。暨南大学经济系和历史系于最近均举行了科学论文报告会，积极推动科学研究。经济系已完成“关于国民经济高速度与按比例发展”等重点项目。历史系有研究东南亚华侨问题的论文多篇。中文系开展关于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的研究，并将于四月底完成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论文集（定稿）。广东师范学院于4月9日—23日举行1960年第一次科学论文报告会。中文系提出“毛主席语言思想研究”等论文14篇，历史系提出论文十四篇，马列主义教研室提出4篇，教育学教研室提出12篇。

目前各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活动空前活跃，这些活动都是以党的领导、教师与同学三结合的方式，并且将和教学革命及学术思想革命运动结合起来进行。

广东社联积极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活动

认真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首先是解决如何在自然科学的教学中贯彻唯物辩证法的问题，这不论对于哲学工作者或者是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我省科学工作者正在这方面进行探索。例如华南化工学院袁孝鹄、姚士裕同志进行了怎样在“化工原理”、“力学绪论”课程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初步研究；暨南大学领导上一向重视在自然科学的教学中运用辩证法，并注意培养新生力量。三月间，省高等教育局在暨南大学召开了在自然科学教学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现场教学会议。暨大数学系助教黄念成在会上作了在数学领域中如何运用辩证法的报告，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一方面的工作，广东社联决定筹备成立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并于三月二十六日举行座谈会，到会的有史丹（暨南大学副校长）、何思贤（中山大学）、黄佚农（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电子研究所）等人。座谈会上对如何组织和推动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活动，交换了意见，并推选史丹同志为筹备小组的召集人。广东省社联为了引起学术界对这一工作的重视，特邀请史丹同志于四月二日向科学工作者约五百人，作了关于“学习自然辩证法的重大意义”的报告。

哲学研究 (月刊)

一九六〇年第三期

目 录

-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的实质 撒仁兴
- 形而上学还是唯物辩证法? 王若水
- 再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 再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郭月争
- 试论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同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的根本对立, 乃是哲学上的两条基本路线的斗争 世 诚
- 兼评王若水同志的“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吗?”一文
-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哲学命题只能
作唯心主义的解释 腾云起
- 关于“同一性”一词的译释问题(资料)

三月十日出版

每册二角二分

“哲学研究”编委会编

订阅处: 各地邮局

理论与实践

月 刊

1960年第4期(总第28期)

1960年4月20日出版

编辑者: 理论与实践编委会

印刷者: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发行者: 广东省广州市邮局

出版者: 理论与实践杂志社

预订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本刊代号: 46—3

刊号: (穗)0363

印张: 4 印数: 22,816 定价: 每册二角